

PE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GORDON TULLOCK

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

特权和寻租的 经济学

[美] 戈登·图洛克 著

王永钦 丁菊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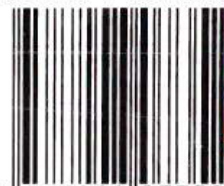


PE

本书是图洛克对其从事了将近40年的寻租领域研究进行的一次回顾和反思。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旨在解释作者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观察到的一个悖论，与寻租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第二部分收集了作者在寻租方面的其他一些短文，包括寻租的定义、寻租与传统的市场分析的关系等。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对寻租进行总结性分析，而是提出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上架建议：经济理论

ISBN 978-7-208-07352-1



9 787208 073521

定价：1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GORDON TULLOCK

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

特权和寻租的 经济学

[美] 戈登·图洛克 著

王永钦 丁菊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美)图洛克(Tullock, G.)
著;王永钦,丁菊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

ISBN 978-7-208-07352-4

I. 特… II. ①图…②王…③丁… III. 非生产领域经济
学-研究 IV. F0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653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

[美]戈登·图洛克 著

王永钦 丁菊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80,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352-4/F·1665

定价 18.00 元

悖论图洛克

一、戈登·图洛克简介

当今学界有实力但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属于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是内容涉及经济学、公共选择、法与经济学、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和外交领域的 23 本著作和上百篇论文的作者,而且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随着其著作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尤其是译作的增多,中国读者开始熟悉和了解这位已经 86 岁高龄的思想深邃、经历丰富的学者。

戈登·图洛克 1922 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Rockford),父母都是苏格兰人后裔。图洛克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图洛克充分利用了芝加哥大学的课程设置特点,5 年之内就完成了 6 年的学习内容,随后在军队服役 3 年,并于 1947 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在其最初的职业生涯中,图洛克不守成规,敢于尝试的鲜明个性就崭露出来。他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

虽然按部就班地去了一家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或许更适合从事其他职业,于是就此告别其律师专业。图洛克在博士毕业前曾参加过“外交服务考试”,1947年秋他被录用为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外交人员。在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培训两个月后,他作为副参赞被派驻中国的天津市,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返回美国。1950年,图洛克被美国国务院派往耶鲁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学习汉语及相关学科3学年(实际学习时间为2年4个月)。1952年底,他进入美国驻中国香港总领事馆“中国大陆”部工作。9个月后又调往美国驻韩国大使馆政治部。1955年1月他被调回美国,分派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情报调查局(OIR, 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2]这段时间让他对政治和官僚生活有了深刻的切身体会,并促使他开始深入研究有关国家、选举、官僚等传统政治学话题。正如在本书中图洛克对自己的评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曾经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为国务院工作。我在国民党时期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生活过,也在李承晚总统时期的韩国生活过。尽管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思考过寻租(的确,我只不过把这些体制称为腐败),但毫无疑问这些经历与我最终发现寻租非常有关。”

图洛克在1956年离开国务院后就主要从事写作工作。期间虽然也有过几个其他工作,包括担任盖洛普(Gallup)集团下驻普林斯顿一家分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但都不足以与之后的研究相提并论,不过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却令图洛克之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改变,即1957年他在费城与布坎南的相识,后者对其极为赏识,也直接导致了1958年布坎南将他作为博士后安排进入弗吉尼亚大学的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这成为了图洛克学

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中心由詹姆斯·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 1957 年创立,“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 1957 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建立一个研究以希望维护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术团体”。^{[3][4]}从 1959 年秋至 1962 年 2 月,图洛克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直到 1962 年 2 月他重新回到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中心担任经济学副教授。从这以后图洛克可谓进入了其学术的黄金时代,一些重大成果也不断涌现,例如 1962 年,他与布坎南合著了《同意的计算》,为公共选择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确立了他与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范式创始人的地位。1963 年,他又与布坎南共同创立了公共选择学会,自该学会成立之日起,图洛克就是其理事会成员和理事,也曾担任学会的会长。1965 年,他出版了对官僚政治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个人专著《官僚政治学》。1967 年,当他在赖斯大学任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时,发表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寻租理论创始人的地位。到 1968 年的下半年,图洛克与布坎南一起重新回到弗吉尼亚,并于 1969 年在弗吉尼亚工学院共创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图洛克任杂志的创始编辑,后来还担任主编长达 25 年之久,使得“这本杂志现在被列为全世界 30 个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而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弗吉尼亚学派”。^[5]

到了 1982 年图洛克又迎来其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即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决定把该中心(包括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和图书馆资料及设施)移交给菲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从此这里正式成为传播公共选择理论的大本营。^[6]随后的 1983 年 6 月,图洛克被聘为乔治·梅森大学霍尔贝特·R. 哈里斯

(Holbert R. Harris)教授,同时承担经济系和法学院的授课任务。从1987年秋至2000年,他又任亚利桑纳大学卡尔·埃勒(Karl Eller)经济学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现在图洛克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布坎南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迄今为止,图洛克获得了不少荣誉,包括1970年因杰出成就被选为美国政治学协会委员会成员;1978年,他还当选为南部经济协会主席;1992年,又当选为西部经济协会主席,同年还获得芝加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则荣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7]

二、学术思想

从上述图洛克独特的经历可推知,他的学术思想可能有与众不同之处,而事实正是如此:他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原创性贡献,特别是新政治经济学方面,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早期关于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的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需求显示方法理论、管制理论、冲突解决理论等。可以说,其文章对于研究新政治经济学而言都是必读的,实际影响也已远远超越了经济学而渗透到其他诸如政治学等学科中。当然,在所有成果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本书中讨论的寻租理论,而图洛克也因此蜚声于学术界。

在寻租理论产生前,最能体现图洛克学术成果的经典著作之一就是《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这是他与布坎南合著的,后者“由于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8]而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2年英文版出版以来,该书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读者最多的经济学专著之一,也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基石。在社会科

学领域里,它也已成为重要的现代经典著作。〔9〕图洛克在书中探讨了一个自由社会下的政治结构(实质上也是经济结构),详细研究了为促进共同利益而由市民设计的政治制度。这本书也体现了图洛克试图以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来解读现代立宪民主制政府运作的思想,并将研究集中于政府在政策实践与社会选择的冲突上,以及原先市场理想的最佳资源分配状态之间的差异上。这说明图洛克是以标准的经济学假定——利己的经济人——为基点来分析,如何为了自身或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来选择政治制度,并对此做出解释。因此,图洛克的研究是基于规范分析的一种基准制度,但是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受限于太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又没有正式的模型给予支持,缺乏公理化的体系,实证结果又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但这依然不能阻止图洛克将公共选择的思想运用于寻租领域,这也成为他最为引人注目和对西方经济学最具挑战性的学术研究了。可以说,他对寻租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他196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中。据美国科学情报所(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文到1990年4月便被引证241次,是图洛克被引证次数最多的论文。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文章的发表却历经艰难,曾先后两次被《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南部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退稿,前者的编辑约翰·格利(John Gurley)曾在退稿信中称该文“作为一个理论贡献不足以推翻评审人的建议”〔10〕;后者的执行主编罗伯特·E.高尔曼(Robert E. Gallman)也认为图洛克误解了哈伯格的论点。

几经周折,这篇论文终于在1967年的《西部经济杂志》(*West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顺带提及,图洛克生平被拒绝的文稿还的确不计其数,以致他在当选了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后,是这样开篇致辞的:“你们学报拒绝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计这篇演讲你们不会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后来他还把所有被拒的文稿编成了一本书,也是经典文献之一,成为一大趣谈。

再回到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图洛克明确指出,从表面上看,偷窃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转移,并没扭曲价格,就不应该存在配置效率或X-非效率上的损失,特别是用哈伯格的方法来衡量的话,也根本不涉及福利成本的损失,仅是财富的转移。然而,偷窃行为却产生了社会成本,它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必然会在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进行反偷窃。比如,私人为了安全而安装防盗门、防盗锁,甚至将贵重物品交由银行看管以及整个国家配备大量的警力,设立监狱、法庭等各种设施。这些反偷窃的人力、物力、资源本身也构成了偷窃的成本。这些活动支出的稀缺资源就构成了偷窃的总福利成本,从原来的“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 Triangle)增加到“图洛克四边形”(Tullock Rectangle)。并且从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它还会随着偷窃行为的发生而不断上涨。

由此看来,图洛克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扩张到了非生产资源领域的配置,从人们追求新增经济利益的行为扩张到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把蛋糕做大的“寻利活动”,后者则是多分割蛋糕的“寻租活动”。所以该文表面上研究的是垄断、关税、偷盗等行为,但着眼点却是对寻租的分析,并且是从公共部门利用职权这一角度论述的。虽然寻租(rent-

seeking)一词并不是由图洛克提出的,而是最早出现在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于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11]克鲁格将“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义为寻租,并由此风靡起来。之后很多年人们都将克鲁格视为寻租创始人,但显而易见寻租的基本思想却早在图洛克的这篇文章中就有详细的阐述,所以尽管没有使用“寻租”这一词语,图洛克也是当之无愧的“寻租理论之父”。

之后图洛克对寻租领域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对政治市场主要行为主体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从立法者、选民、媒体、利益集团和官僚等角度来探讨寻租。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哪些寻租行为才是有效寻租,对租金进行细化。此外,还从反寻租的角度来研究寻租行为的方方面面,从中不断拓展其寻租模型,形成了有关寻租的成本和收益、寻租的政治市场、有效寻租、护租、创租、抽租以及如何减少寻租等一系列独具特色而又有启发意义的寻租理论。如今,寻租这一概念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界而进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三、评价

在图洛克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还曾经选修过一门、也是唯一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负责讲授的正是在芝加哥学派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 Simons)。图洛克并没有学完这门课程,所以不能高估这半学期经济学课程对图洛克的影响,但是从图洛克1987年创立亨利·西蒙斯学会(Henry C. Simons Society)中还是能看出芝加哥大学、西蒙斯对他的经济学

生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

人们对图洛克的评价是他与其他经济学家非常不同,布坎南曾称图洛克是一位天才经济学家,这也体现了整个经济学界对他研究方法的想法。特别是从图洛克的经历来看,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图洛克的法学训练没有使他成为一名法学家反而成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其在美国外交部长达9年的任职,也给了他很多直观的认识和启示。其实,图洛克并没有接受过正统、职业的经济学训练,但天赋却引导他把经济人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据布坎南回忆,1957年他在费城第一次遇到图洛克时,当时他离开外交部还不到一年,正带着那本《官僚政治学》手稿寻找出版社。布坎南阅读后,发现他对官僚体制的分析非常有吸引力,并认为,“手稿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贯穿了这样一个假定,即无论其职位的高低,官僚只对他所面临的奖励和处罚做出反应。这个直接的,现在看来是如此简单的假定,推翻了整个后韦伯主义对官僚体制的准规范分析。图洛克在手稿中把官僚变成了经济人,而不是标准官僚理论中的经济人”。〔13〕

而图洛克在1998年荣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时,被公认除了众所周知的寻租理论外,“还有其他三项贡献分别是:第一,坚持经济人分析方法并努力拓展经济学领域,为营建这样一种职业氛围做出了贡献,在这种职业氛围中,不属于经济学的传统领域,如政治学、法学、生物学、军事战略和冲突的解决都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第二,他早期关于互投赞成票的著作和对《同意的计算》(与詹姆斯·M.布坎南合著)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为公共选择范式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三,在公共选择运动的制度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是《公共选择》杂志的创始编辑,并在这一岗位上工作25

年之久,他还促成公共选择学会的形成。”^[14]

当然,图洛克也不是没有遭到争议。布坎南就曾经指出图洛克的著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能把对理论的分析说明与个人生活的轶闻趣事区别开来。此外,非议最大的就是对他的法学背景出身,有些人就认为这既开拓了图洛克的视角,也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为非科班出身的他很难用经济学经典的且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向后来的研究者传播其思想,且在发展和完善所研究的领域上也存在一定不足。对此,图洛克的老朋友乔治·梅森大学图洛克研究所所长查尔斯·罗利(1987)认为:“接受法律训练的律师与正统经济学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对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律师倾向于从一系列相关的事件中归纳出普遍真实的东西,而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从普遍真实的东西中演绎出具体的结论。第二,律师关心的是围绕着具体案件的各个细节,不喜欢经济学家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法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第三,律师不习惯、甚至怀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局部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都需要律师对相关因素做出全面的评价。”^[15]以上三个方面的对立不仅反映在图洛克众多的论文和论著中,律师式的说理方法使得其经济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相当程度的阻碍,尤其是在20世纪以建立模型的技术水平来论资排辈的六七十年代。这就出现了经济学界的“图洛克悖论”(the Paradox of Tullock):作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图洛克运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入侵了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甚至非人类行为的领域。但由于缺乏巩固他所入侵领域的工具,他不可能充分享有他所开创领域的收获,在许多时候,往往被紧随其后的“殖民者”夺去或分享他新开拓的领域,寻租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

四、关于本书

本书就是图洛克对其从事了将近40年的寻租领域研究进行的一次回顾和反思,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对寻租的各个方面内容做出了较为详尽而易懂的阐述,对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相关现象进行了另一种解释,可读性较强。

本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旨在解释作者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观察到的一个悖论:华盛顿有很多专事寻租的利益集团的机构,但是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与寻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例如,奶制品业的寻租支出相对于每年从纳税人口袋里得到的5亿美元来说是很小的。对于习惯于完全竞争市场范式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的确是有点不可思议:寻租引起的巨大收益应该会引起其他寻租者进入这个寻租市场来“竞租”,直至租金被完全竞走为止(即租金耗散)。

如何来解释这个悖论呢?图洛克首先列举了六种传统的解释,但他认为这六种解释都差强人意,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图洛克则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寻租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的大小。拿奶制品的例子来说,人们由于集体行动的问题并有激励去搜集有关该产业寻租带来的损失的信息(理性无知),所以就没有反对乳品价格支持政策和其他农业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在公共选择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丹尼斯·缪勒看来,图洛克之所以得出这个世界上寻租甚少这个结论,主要是因为它将寻租的概念仅仅局限于那些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活动上。根据图洛克的定义,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品改进花费了1000万美元,从另外的一家企业那里攫取了1500万美元的租,最后产生了100万美

元的消费者剩余,企业花费的 1 000 万美元不是用于寻租的支出。缪勒认为,其实寻租并不是一个 0 或者 1 的活动,而是一个连续的活动,因此可以相对地来定义寻租的“度”:1 减去新的剩余(即新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与初始租金之比。例如,如果一项产品的更新产生的新的剩余等于原来的利润(租金)的 20%,那么寻租度就是 80%。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寻租活动的范围就要比图洛克教授定义的要多得多。〔17〕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集了作者在寻租方面的其他一些短文,这些短文涉及了广泛的内容,包括寻租的定义问题、寻租与传统的市场分析的关系,寻租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以及与转移支付税收改革的关系等。书中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并没有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一些不太正式的想法,所以作者将这部分命名为“关于寻租的随想”。

与其说本书是图洛克对寻租的系统分析,不如说是作者对寻租的持续的思考和对早期研究的反刍。作者的文风也具有鲜明的图洛克风格,穿插着信手拈来的见闻和轶事,夹叙夹议,娓娓道来。从图洛克的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关于寻租问题的答案,他都像机关枪一样不断地向读者发问,有时又像自言自语。世界上有很多类学者,有些学者擅长回答问题,有些学者则善于提出问题,图洛克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对于读者而言,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对寻租进行总结性分析,而是提出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对于培养读者从现实世界中发现和提炼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们看来,作者之所以在规范性问题(如,寻租是否降低了效率)上缺乏定论,是因为作者在分析的时候缺乏必要的参照系(benchmark),现实中最好的制度也不过是某种现实约束(尤其是信

息和激励约束)下的一种次优安排。所以,重要的是提出更准确的问题(well-structured question),是要辨别出潜在的约束条件。尤其是对寻租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过程,早期的寻租文献要么在政策过程问题上缺乏共同的假定,要么将其简单地假定为类似市场的简单过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同时很难在理论上得出普适性的结论。由于对问题本身的界定和结构在理论上并没有清晰的分析,所以也就很难进行相应的经验研究。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类对具体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的理论文献,这些文献借助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工具,正在逐渐打开政治过程这个黑匣子。人们往往将这类文献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文献,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主要有托尔斯滕·佩尔松(Torsten Persson),吉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ihanan Helpman),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等等。目前这类文献还正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下,图洛克的这本书就显得更有价值了。读者可以看看他提出的一系列的经典问题在目前的文献里是否得到了回答;说不定你也可以尝试着提出自己的回答呢。

译者

2008年2月于复旦

附表 1 图洛克主要著作与论文被引证情况(截至 1991 年 4 月)

引证次数	著 作
1178	<i>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i> (with James Buchanan)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281	<i>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i> (edited with James M. Buchanan and Robert D. Tollis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3	<i>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i>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5).
184	<i>Toward a Mathematics of Politics</i>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80	<i>The Logic of the Law</i>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1).
70	<i>Private Wants, Public Mean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esirable Scope of Government</i>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66	<i>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 Exploration into the Human Experience</i> (with Richard B. McKenzie)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Inc, 1975).
54	<i>The Social Dilemma: The Economics of War and Revolution</i> (Blacksburg, VA: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1974).
30	<i>The 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i> (Hingham, MA: Kluwer-Nijhoff Publishing, 1987).
28	<i>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5	<i>Trials on Trial: The Pure Theory of Legal Procedure</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引证次数	论 文
241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i>Western Economic Journal</i> 5 (June 1967).
95	"Polluter's Profits and Political Response: Direct Controls Versus Taxes" (with James M. Buchanan),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65 (March 1975).

(续表)

引证次数	论 文
88	"A New and Superior Process for Making Social Choices" (with T. Nicolaus Tiderna), <i>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i> 84. 6 (October 1976).
72	"Does Punishment Deter Crime?" <i>The Public Interest</i> 36 (Summer 1974).
64	"The General Irrelevance of the General Impossibility Theorem", <i>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i> 81(May 1967).
62	"Problems of Majority of Voting", <i>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i> 67 (October 1959).
55	"Why So Much Stability?" <i>Public Choice</i> 37. 2(1981).
49	"The Transitional Gains Trap", <i>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i> 6 (Autumn 1975).
44	"The Charity of the Uncharitable", <i>Western Economic Journal</i> 9 (December 1971).
44	"Dynamic Hypothesis on Bureaucracy", <i>Public Choice</i> 19 (Fall 1974).
34	"Federalism: Problems of Scale", <i>Public Choice</i> 6(Spring 1969).
34	"Public Decisions as Public Goods", <i>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i> 79(July/August 1971)
31	"A Simple Algebraic Logrolling",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60(June 1970).
31	"Entry Barriers in Politics",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55 (May 1965).
30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i>Public Choice</i> 11(Fall 1971).
24	"The Expanding Public Sector: Wagner Squared" (with James M. Buchanan), <i>Public Choice</i> 31(Fall 1977).
23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Crime", <i>Social Science Quarterly</i> 50 (June 1969).

说明:(1)到 1991 年 4 月,图洛克的著作和论文总共被引证 3 991 次,附表 1 中仅限于被引证 20 次以上的著作和论文;(2)附表 1 中有关引证次数的统计资料来源于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ISD)提供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资料来源:Garey C. Durden Larry V. Ellis and Steven W. Millsaps, "Gordon Tullock: His Journal and His Scholarship", *Public Choice* 71, 1991, pp. 189—190.

附表 2 图洛克著作和论文被主要经济学期刊引证的情况(截至 1991 年 4 月)

期刊名称	次数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94
<i>Bell Journal Economics</i>	11
<i>Econometrica</i>	26
<i>Economic Inquiry</i>	47
<i>Economic Journal</i>	27
<i>Journal Economic Literature</i>	34
<i>Journal Economic Theory</i>	14
<i>Journal Finance</i>	4
<i>Journal Law & Economics</i>	43
<i>JMCB</i>	8
<i>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i>	1
<i>Journal Political Economy</i>	69
<i>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i>	26
<i>Review Economics & Statistics</i>	6
<i>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i>	94
合计	504

资料来源: Garey C. Durden Larry V. Ellis and Steven W. Millsaps, "Gordon Tullock: His Journal and His Scholarship", *Public Choice* 71, 1991, p. 195.

注 释

[1]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中西部法学院的大学教育一般由两部分构成:3 年本科教育(包括法律预科课程)和 3 年正规的法律训练。但芝加哥大学有所不同,它由 2 年本科教育和 4 年法律训练(包括法律预科课程)构成。

[2] 图洛克的个人经历参见李政军为《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分析》(塔洛克著，李政军、杨蕾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写的译者序。

[3]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4] 当时的杰弗逊中心吸引了世界上许多顶尖经济学家来做至少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弗兰克·奈特(有芝加哥学派教父之称)、F. A. 哈耶克(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蒂尔·俄林(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邓肯·布莱克(被认为是公共选择之父)等，直接促进了公共选择研究的繁荣(布坎南，1989)。

[5]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6]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7] 1965 年设立的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授予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杰出贡献的资深美国经济学家。该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名。历届美国经济协会会长、历届弗朗西斯·沃克奖得主为当然的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而不复评选。

[8] 摘自瑞典科学院关于布坎南的获奖公告。

[9]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出版的《政治学手册》就把它列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与此并列的有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这几本著作都有中译本)。

[1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6, 1966).

[11] Krueger, An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June, 1974.

[12] 参见李政军：《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分析》，译者序言，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3] Buchanan, James M., "The Qualities of a Natural Economist", in *Democracy and Public Choice: Essays in Honor of Gordon Tullock* (Rowley, C. K. 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14] 参见《美国经济评论》，1998 年第 4 卷。

[15] 见注[11]。

[16] 参见李政军：《塔洛克寻租理论开创性论文的遭遇和所引发的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 年第 1 期。

[17] Mueller, Dennis, 1990, "Review", *Economic Journal*, Vol. 100, No. 402 (Sep.), pp. 976—978.

前 言

本书的读者可能已经知道,我已在不幸被称为“寻租”的这个领域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寻租是指资源的利用实际上降低了总产出,却使得少数人获利。令人遗憾的是,它是大多数政府的主要活动。结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之谜:寻租活动在主要的社会中都大量存在,但是专事于它的产业却远不及这么大。虽然在华盛顿,寻租业是风景线中亮丽的一部分,但当你考虑有多少钱被这一行业运作时,金额相对来说却是比较小的。因此,本书首先试图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解释这一差异?

第二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寻租看上去都是非常低效的。最近,我估算了农业补贴方案对社会造成的净成本和给农场主带来的净收益,前者是后者的很多倍。事实上,从长期来看,这个方案的实施说不定还降低了农场主的福利。当然,在任何一个给定年份中,取消这一计划会给农场主带来很大的痛苦。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我将提出几个解释,它们之间可能是互补的。所有的这些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尽管理

论上可能,但去检测它们却是困难的。

以此作为开始,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收集了一系列有关寻租方面不同内容的各种文章。这些文章是要填补现在有关寻租文献的空白,而不是做一些基本的变化。因而,不像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没有一个单独的主题。

我要感谢很多人对写作这本书的帮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参加了我的讨论班和会议后,对这些不同的文章做出了评论。他们的评论很有帮助,但是我没有做好记录,因此并不能明确地知道是谁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仅仅能对所有帮助我的人表示一个总体的感谢。

此外,我必须感谢自己作为《公共选择》的编辑,允许再版《公共选择》的第三章。我也要感谢弗雷泽学会、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和《当代政策问题》允许再版倒数第二章。第三章正在被翻译成日文,将在《公共选择研究》上发表。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秘书莎莉·麦克伊文(Shirley McEwen),感谢她的勤奋工作。

目 录

1 悖论图洛克

1 前言

第一部分 为什么寻租业规模如此小?

3 第一章 引言

11 第二章 租金、无知与意识形态

29 第三章 寻租成本：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41 第四章 有效寻租、规模不经济、公共品和道德

第二部分 关于寻租的随想

49 第五章 寻租：定义问题

58 第六章 寻租和市场

66 第七章 策略性行为、混合策略和纳什均衡的缺陷

72 第八章 寻租和转移支付

77 第九章 寻租和税收改革

88 第十章 总结性思考

96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为什么寻租业规模如此小？

第一章 引言

我在华盛顿居住的那段时间,对这个城市寻租业的规模和整体的繁荣情况印象深刻。然而,随着逐步深入地了解,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产业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呢。例如,在离我公寓不远的地方,就是奶制品业游说团的总部大楼。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写字楼,远不及人们理所应当想像的那么大,毕竟奶制品业主每年从纳税人口袋中掏走大约 5 亿美元。考虑到这些开支仅仅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并且提高价格的规制也是为了少数集团利益,人们可以设想每年社会总成本大约是 2 亿美元。通过这些已知的数字,我们惊讶地发现寻租业规模如此小。

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目前我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它生产一种具有一定危险度的产品,还生产其他产品。我们企业的规模很小,以致不能在华盛顿维持任何形式的常驻代表处,但是如果消费者安全保护委员会命令禁止生产该产品时,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因为继续生产该产品的贴现值大约等于 50 万美元,我们当然不想失去它。

按照合同,我们雇用了一个兼职说客,在这个问题上他大约每周花两天半的时间。他知道谁是要找的公务员,也知道哪些类型的说辞会打动他们。因此,消费者还是买到了这个有用但略有危险的产品。对企业而言,成本(包括董事长和总裁在华盛顿的短期开支)低于 1 万美元。我们的确做得不赖。严格来说,在这件事中我们并

没有寻租,因为我们没有寻求任何特权,也没有要求对市场施加限制,我们仅仅是想让产品继续留在市场中。

但事实上,我们曾经确定了一个适度的寻租目标,但是没有实现。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上清楚且详细地标明了关于其危险性的警告和仔细的用法说明。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得到消费者安全保护委员会提供的警告或者至少认可我们的措词,这都将有利于我们今后的诉讼(如果有的话)。但我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1]

和游说团活动的价值相比,我们所花成本是相当小的。我可以举出更多详尽的例子,但是通过访问华盛顿和思考那里的游说团活动对经济生活造成的伤害,任何一个人都会相信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影响政府行为的投资看上去会有如此高的收益呢?

不妨考虑一家钢铁企业,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将利润提高2万美元。第一种是花10万美元的成本来建立一家新钢铁厂,并充分利用其高效率。第二种是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特权,比如禁止从韩国进口钢铁,这样也可以增加相同的利润。假设企业只是根据开支的大小在这两种投资决策中做出选择,显然,企业将不会投资建立新厂,除非游说政府的行为成本接近10万美元。当然,应该是这两种活动的边际成本相等,而非总成本相等,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表明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可能认为,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寻租业的投资和收益以及数量应该是相当的。但很明显,如果这个产业崩溃,其所造成的损失要比看上去的成本大得多。我们会再一次地问,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本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当我思考这件事情时,发现有许多可能的解释。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1)它们用现在可得的数据是不能被验证的(尽管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

(2)它们之间没有相互矛盾。所有的解释都有可能是对的,尽管我认为都对不太可能。

我也曾试图去解释为什么大部分这些管制和收入转移是缺乏效率的。当我写下这一页的初稿时,一家日报刊登了关于“中部亚利桑那州项目”的新闻^[2],这一项目是一个在建的昂贵的大型灌溉系统。它将为流经南亚利桑那州的水提供补贴,从而提高政府提供价格扶持的几种农作物的产量。为了维持这些农作物的高价格,农业部必须削减它们在市场中的数量。根据这则新闻报道,政府估算花费 23.8 万美元来处理这些被大量补贴的“过剩”农作物。而我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关于这一项目并非根本是无效的讨论。^[3]

如果一个人认为寻租业是低效的,解释这种低效并不困难。但为什么寻租业就应该是低效的呢?为什么寻租业规模如此小?这两个问题将有待后文来回答。但我知道,这些问题没有定论。我的目标就是开启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不是画上一个句号。同时,我也鼓励读者们对这一领域的进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我给出六个可能的解释,其中每一个都将在后面给出更为详尽的分析。首先,为了进行更多的寻租活动必须欺骗公众。这一欺骗通常要求人们选择低效的生产方式,不管租金的来源是什么。因此,人们寻租的实际价值比看上去的要低得多,寻租业的规模也就相应地下降了。关于这一主题已经有两篇文章发表了,下面的讨论仅仅是在它们基础上的适当修改。

第二,寻租的实际成本基本上是由选民直接承担的。讨论这一点的那一章原先在《公共选择》上发表,标题为“寻租的成本: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4]既然这样,寻租是否有成本就不是那么明了了。

假设大部分国会议员是为了获得官职(比如,赢得选票)而投票

支持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进一步,假设选民们的确投这些人的票,但他们又没有太多地关心政治信息,以致那些试图改变他们观点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成了一种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寻租业规模似乎要比从中得到的租金小得多,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投票行为是否会产生成本。当然,如果不这么做,社会的福利将得到改进,但民主的本意就是为了能够产生一个服从投票者固有要求的政府。

这两种解释看上去都是合理的;我不知道如何去验证其中任何一种。而且,它们并不相互矛盾。换言之,这两者都可能是正确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寻租业表面上的规模。我认为剩下的四种解释没有那么合理,但也不能说它们一定不正确。验证它们也是很困难的,且不一定和前两者矛盾。换言之,所有的六种解释都可能同时正确。

第三种解释是关于有效寻租^[5]的数学问题。按照这种解释,寻租活动造成的社会浪费会更多。如果寻租被认为是规模不经济的,那么这个解释就是正确的;如果寻租活动是通常的U形成本曲线,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规模经济,超过这个范围则存在规模不经济,并且U形成本曲线的底部接近竖轴,这个解释也是可行的。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知道寻租活动生产函数的形状。

第四个合理性差一点的解释是,寻租业受制于规模不经济,这并不针对单个寻租企业,而是就整个寻租业而言的。坦白地说,我发现这个解释不是很合理,但允许我简要解释其含义。

在这个模型中,单个企业进入寻租业,直到产业总体规模达到另一个进入者将获得负利润为止。在初期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抢先进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一个行业的总成本远低于其收益,那么至少表明该行业的单个企业成本曲线和行业成本曲线的关系很

异常。虽然我证明不了其错误,但我必须重申,它是不合情理的。

第五个解释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马上想到的,即寻租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创造了公共品,因此,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就有可能搭便车。虽然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用这么少的钱就可以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我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第六个解释,我发现也是不合理的,即人们把寻租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结果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参与这一活动。我找不到好的方法来证明或反驳这种解释。大众的观点在这方面五花八门,人们的感觉也难以推测。

这一节大部分提供了寻租业规模小于人们预期的各种可能解释。我在不同的大学宣讲论文时,介绍过这些解释,通常每次讲一篇。在宣讲中间或者在宣讲后的讨论时间,听众经常提出第七种解释。既然提出这种解释的都是一流经济学家,我就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它是错误的。我也必须承认这种解释看上去似乎有理,难怪这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来。

这个解释就是:垄断租金将随着竞争而耗散。“卖出”价值 10 亿美元等价物的国会议员知道,其他国会议员也会这样做。在竞争的过程中,他的实际收益会降低,如降到 1 万美元。

有两个理由足以表明这个“市场”的这种特殊的竞争方式运作不灵:一个是从供给方面,一个是从需求方面。我们先从供给方面开始解释。首先,我们注意到,像任何其他民主机构那样,国会本质上是卡特尔形式运作的,只有国会两个议院中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才可以通过一项法案。

而且,虽然建立不同联盟的企业家可以竞争消费者,但是不同

机构的大多数派之间的竞争却不太可能。即使任何投票联盟的成员索要相同数量的金钱,这种竞争可能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显然,对于议案、法案等等,这里的分析都是成立的。但是,提出这种可能解释的人指出,国会议员为各自选区的选民提供优惠。关于这些优惠首先要指出的是,每个选区只能选举一名国会议员,所以他拥有地方性垄断权。还必须承认的是,国会议员经常向那些在其选区之外的压力集团提供优惠。国会议员之间会为了争得利益集团的“生意”而相互竞争。

但是,我认为这种竞争并不会很大。单个国会议员实际上并没有很大权力,和他一起的官僚们知道,除非他能够得到其他国会议员的支持,否则他就没有任何权力。基本上,他向支持者提供一定数量的优惠,而且坚信,一旦事情不妙,其他的成员会提供援手,因为他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他们之间有一种隐性(有时候是显性的)交易。索要低价的国会议员会发现,另一个因此而出局的国会议员将不会和他在多数联盟中合作。我们再一次看到,宪法安排基本阻止了竞争性削价。

有时候,某个国会议员可以通过开空头支票的方式来欺骗一位官僚来支持他。在这一层面上,为了卖给压力集团,国会议员之间将有竞争。然而,即使官僚们具有相当工作能力,竞争也不会很大。而且,他肯定不能解释像农业补贴方案这样的事情。农业补贴方案必须被国会大多数人通过,这需要农场代表和足够多的其他人进行交易,方案才能被通过。换言之,国会议员是不会为了成为(美国)国会中的农业集团的客户而展开激烈竞争的。

第二个问题是从需求方面来看的。假设国会议员能够出售他们提供的优惠,并为此目标而相互竞争,那么这些优惠的价格

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这些优惠的人就增多了。相互竞争的国会议员偏好 2 000 美元胜过一无所有,如果你能够以 2 000 美元的价格买 100 万美元的优惠。因此,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数接近于无限。

在这些假设下,寻租业的实际规模应该与国会议员能够抽取他们服务的全额价值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其组织形式。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华盛顿将有很多很小的游说团体。准备付出 2 000 美元的游说组织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直到收益乘以得到收益的概率之积等于那小额的成本。显然,现实不是如此。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寻租业的总规模也应该大得惊人,尽管它是由清一色的专事于某一小的利益的人组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国会议员能够组织成卡特尔,人们将会预见到类似墨西哥的情形:政客们从较小的、前景欠佳的寻租者群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但我们都没有观察到这两种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我想要解释的。

类似地,不妨考虑纽约的出租车经营牌照,假设每个牌照现在价值 10 万美元。如果牌照分配从现在的官僚垄断者控制转移到一个竞争性组织,如私人企业,牌照的价格会迅速跌落,直至牌照的实际价值,可能只是 50 美元。出租车数量也会大量增加,当然,他们对顾客的收费也会下降。^[6]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我还想不到一个自然的解释),这些竞争单位所卖的数量受到限制,牌照的价格就会保持在高的价位,这些单位就会变得比较富有。我穿插这些评论是因为,至少存在着如下的可能性:由于组织的原因,国会能够支配的优惠的数量不能超过一个最高的限度。这些现象不会在出租车牌照的例子中出现,我也不

认为它们会出现在国会的情形中。

因此,国会议员通过彼此之间的竞争耗尽他们自己的租金这一理论并不符合现实。首先,宪法禁止他们削价竞争;第二,竞争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优惠的接受者对社会施加那么大的成本。现在让我们转向更合理的解释。

注 释

[1] 我们仍然偶尔被起诉,经常是那些没有阅读警告说明的人,要求适度的经济赔偿。但瓶子上显著的头骨和交叉腿骨的图形,有利于我们的律师辩护。

[2] *Tucson Citizen*, Friday, March 11, 1988, p. A-1.

[3] 很久以前,在纽约我看到一幅漫画,里面有一个国会候选人在一个沙漠加油站向一小群人发表演说。他引述道:“……当斯密斯计划将这个沙漠变成茂盛的花园时,我将立刻接洽农业部。”事实也不过如此。

[4] *Public Choice*, Vol. 57, No. 1 (1988), pp. 15-24.

[5] 从我的“Efficient Rent Seeking”一文开始,这方面文献变得非常多,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Texas A&M Press, College Station, 1980)。

[6] 这里假设价格将不再受现在的法律所管束。

第二章 租金、无知与意识形态

在这一章中,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解释为什么寻租业规模如此小。我将对理论进行一些修改,以便更好地符合现实情况。这一修改看上去不是很大,而我确实认为不大,但它更接近现实。这个修改绝不会减少人们平常所诟病的寻租导致的浪费。在我的《租金和寻租》^[1]一文中,我论述了这一浪费比实际的大得多,本章中保持了该数量。大体上来说,浪费的数量没有改变,但形式却发生了变化。

我已经指出寻租业规模太小了。通过简要讨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我用现代寻租理论来详细阐述这一观点。首先,租金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足够高。例如,国会议员贝艾吉(Biaggi)曾经携手联邦政府把布鲁克林的一家大型造船厂从破产中解救出来。后来,审问他时,他承认从造船厂管理层那里接受了总额价值3 000美元的三次在佛罗里达的度假。^[2]和我们正在讨论的寻租浪费数量相比,这笔租金是很微不足道的。

在另一个案例中,克莱斯勒汽车企业为了摆脱困境,总共花了39万美元来雇用正式说客。^[3]这又一次证明,租金数额相当少。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一些支付是没有公开的。然而,就算支付总额是公开数额的十倍,和政府行动的花费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总统竞选献金同样很小。如果我们假设通常的选举活动总花费是10亿美元(可能高估了)^[4],和各种为了特殊利益集团而强加

在经济上的限制所产生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少的。不考虑价格的上涨,我们曾经提到的农业补贴方案直接预算成本一年在 150 亿到 300 亿美元之间。农场主游说团的献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美国政客们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更多的证据。和墨西哥的官员不同,这些美国人退休时并不是十分富有。虽然他们无疑是富裕的,但生活方式离巨富还相差很远。考虑到他们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造成的经济扭曲的总社会成本,这是很奇怪的。^[5]

举个具体的例子,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的成员把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利益给了石油产业。他们当初是被选为官员的,无论在任职期间还是退休时(每个人服务 33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主要依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薪水生活。当然,他们经常参加丰盛的宴会和访问价格昂贵的名胜,但和他们的决策造成的影响相比,这些收益还是微不足道的。^[6]这些不经意的观察虽不是理想的指标,但也不会谬以千里。

我们所观察到的寻租业规模看上去和现有的寻租理论相悖,这并非个例。另外,有一个补充的观察就是,租金通常以非常无效的方式被转移。赋予某人在某个方面的垄断权是一种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低效的将利润转移给他的方式,不论是什么利润。而且,在大多数对有价值的生产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这种优惠不是赋予了某个人,而是赋予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一群生产者;这些生产者面临的市场价格要高于不受管制的市场的价格,他们会提高产量来尽可能地攫取高价格带来的好处。利贝凯普(Libecap)论证了,得克萨斯的铁路委员会远没有最大化得克萨斯石油生产者的利润。^[7]

“民航局(CAB)控制了价格竞争,但是允许航空企业为了竞争顾客而提供非价格手段,如免费饮料、电影和半满的舱位。航空企

业通过额外的成本相互竞争,民航局制定的价格带来的租金就被耗散了。”^[8]在这项价格管制实施的后期,一个跨越大陆的航空企业竟然在其航班上设置了一个钢琴吧。这仅仅是在民航局制定的价格下,为了竞争顾客,各个航空企业的飞机半满状态的极端例子。事实上,和现在座位更紧凑、更多满舱、价格也更低的情形相比,航空企业当时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利润。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观察到这两种现象呢?请注意,我并没有更多地引证是因为读者自己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由贝克尔(Becker)[佩尔兹曼(Peltzman)特别支持他]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寻租体制中不存在低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推迟回答,直到我提出一个关于寻租浪费的理论。

图 2.1 说明了一种寻租者面对技术困难时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只能选择一种不恰当的生产技术来获得租金。我们将在基础的理论提出来之后,再讨论为什么他们只能选择这种不恰当的技术。

图 2.1 给出了通常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这个例子中,供给曲线(CC)是可变成本线。CC 线和价格 P_0 之间的三角形就是从这个行业的固定资源所有者那里得到的租金。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麦地,这就是李嘉图租金。假设现在生产者组织起来并受到政府的管制保护。^[9]管制的具体细节是由政治考虑决定的,不在本章讨论之列。

然而,这里假设贸易管制是和接受低效的生产方式一起进行的,在图中表示为成本增加到 $C'C'$ 。价格上升到 P_1 ,产量下降到 Q_1 。标准的寻租三角形由 Q_1 左边及 P_0 和 P_1 之间的区域构成。我将图中的三角形分割成两种,下面将详细论述理由。^[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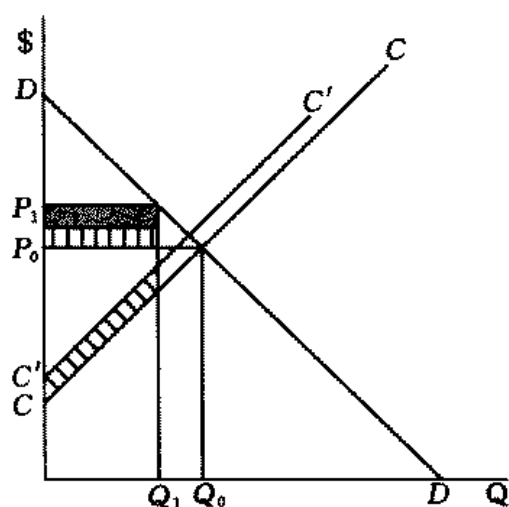


图 2.1 受限的寻租

让我们考察 19 世纪早期英格兰发生的劳工运动。表面上看来,工人们的工资是由相互竞争的制造商来支付的^[11],他们破坏了用来制作长袜的纺织机。如果工人们工作,他们会为社会生产产品。然而,当他们停止工作,社会就失去了这些产品。当然,最根本的受害者还是这些不工作的工人自己。但当他们忙于破坏机器时,社会损失的不仅是直接的产品,还有机器。^[12]即社会不仅失去了产品,纺织机也遭到了破坏。

传统寻租理论只考虑到遭到破坏的机器,而忽视了直接的产品损失。因此,成本比之前学者(包括我自己)所认为的要高。工人们不仅以破坏机器的形式制造了贫困^[13],也抑制了财富的创造。两者都是损失。

这里我们假设寻租活动不仅包括管制还包括采用低效的技术。因此,成本曲线上移到 $C'C'$,因而低效技术产生了净损失,由图中斜线区域表示。既然人们仍然留在这个行业中,也就是说,管制没有消除的那部分人必须采用这项技术,这就增加了其成本,在图中我将这一区域转移到寻租三角形中,由用竖线表示的小长方形来表

示。因而,从寻租组织人的角度来看,寻租的实际收益就是图中带点的小长方形,比价格上升的总幅度要小多了。当然,这是低效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再回到劳工运动的例子,坏掉的纺织机是那些能干的激烈竞争者的财产。雇用这些劳工的制造商无论在技术还是产品促销上都更保守。他们得到的好处并不是由于全部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整个三角形,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不得不采用更贵的制造技术抵消了部分价格上涨,如图中阴影部分小长方形所示。他们雇用那些破坏纺织机的工人的收益仅仅是带点的小矩形。估计雇用这些劳工的支出数量,我们发现,寻租成本将不会超过这个小长方形。

即使这些也不能表示全部的损失。工人们通过破坏机器对社会造成了直接损失。当机器遭到破坏时,其所有者的损失没有直接在图中被表示出来。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参与了破坏活动,这些机器的破坏者可能仅能依据劳动赚到普通的收益。如果他们在同样的工资条件下被雇用来做一些建设性的事,那么就会有利于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杜绝破坏。他们直接生产的产品并不在我们的图中表示。因此,实际寻租损失比经典理论揭示的要更大。

当我们分析这一解释时,我认为这在经验上可以直接用来理解寻租业的低的资源投入。在社会中,付给寻租人的报酬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租金受益人的实际“利润”比传统的寻租所衡量的要低得多(在这里,传统方法大概有 20 年)。因此,实际上国会议员贝艾吉可能得到了其干预的全部利益。

不仅在航空企业和布鲁克林的造船厂有这样的问題,农业部门也是如此。政府补贴项目通常采取限制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土地的数量这种方式。这使农场主改变其生产技术,从而使用更少的土

地、更多的肥料以及其他资源(这样成本更高,他们说不定已经用过该技术了)。

现在该项目已经得到了调整,以阻止成本的无限扩大,但是采用历史产量意味着这些以前的技术还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现在的体制阻止了某些能够提高效率的技术变革。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个问题。农场主长期得到的好处要比补贴与价格的上涨之和少得多。

很多政府限制项目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是一种投入资源数量上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卡特尔。例如,农场主多年来面对所用土地数量的限制,但是在其他资源上没有限制。在这些限制措施下,人们能够也可以投入资本并改变技术;因此,生产者的利润比起购买者的成本而言是相当小的。另外,这可以由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形中的无谓的损失来表示。这种情况被称为“受阻的竞争”,而不是垄断或寡头。

因此,对于真正的寻租而言,总成本不仅仅是带点的三角形,或者加点的三角形加上竖线区域(这是传统的寻租成本)。上文讨论的机器遭破坏的例子表明,损失还包括了用同样的资源来生产利润的产出。^[14]因此,用来创造租金的资源,即为了一些管制去游说政府,不仅是种浪费也是种危害,正如劳工们会花精力去破坏机器。这些损害和浪费的资源总和就是寻租的成本。

这里的使用低效技术是怎么一回事呢?到目前为止这一分析看上去只适用于带点的三角形,或者是带点的三角形减去标准的李嘉图租金损失(在图中表示为下面的小三角形)。在低效技术中所使用的资源会被浪费。我们这里的问题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关系到如何理解浪费和损害。既然我们假设政府以这种特殊的不经济的

技术方式作为对管制措施的“收益”，制造这种收益所耗费的资源也成为导致产出下降的资源的一部分。

农业游说团雇用那些熟练的专业说客告诉他们，如果真的想要从政府那里取得补贴，他们就要通过降低农业部门的技术效率来获得这些补贴。他们必须使用更少的土地和更多的化肥。技术上的变化和努力实现总产出减少以及 GNP 下降，数量上与直接花在游说团议员上的开支一样多。

回到我们劳工运动的例子，他们并没有破坏所有的纺织机，而仅仅是那些最有效的生产者的机器。^[15]低效生产的额外成本也属于寻租成本。为了取得管制措施，游说者认为必须采用一些方针，这些方针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也是农业补贴方案的社会成本。显然，这里的浪费不仅有农场主可以完成的工作损失，还包括以破坏性方式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额外成本。

当我们转向必须接受低效生产方式作为寻租活动的一部分时，我们发现其总成本可能很难衡量。这是因为这种低效技术可能对那些不在这个产业中的人们产生外部效应。航空企业采用半满的飞机飞越大陆，被认为是增加了对飞机的需求，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也许还有其他好处。^[16]

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本身只会为这样的制度而斗争，在这种制度下，该行业低效技术的成本低于它从管制措施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它将在通常的寻租方式（如游说活动）中用尽资源，直到在这种低效技术下生产成本的剩余和管制下的价格完全被寻租活动所吸收。

如果看过我的文章《有效寻租》^[17]和各种类似的文章，读者就会知道我对上述观点并不赞同（不熟悉这些资料的读者会在第四章

中找到该观点的回顾)。先将这个问题暂时放在一边,从《垄断的福利损失、关税和盗窃》^[18]一文到现在,用寻租成本的标准方法分析都认为,游说和其他寻租活动的投资收益与一般投资收益(如建立钢铁厂等)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均衡中,管制措施的贴现值就会完全被寻租成本所吸收。

对谋利的制造商来说,改造钢铁厂和去国会说服对从日本进口的钢铁实施配额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我在《有效寻租》一文中已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我还会在这一章中贯穿该文中的那些假设。我真诚地希望,现在让我们觉得陷入矛盾的有效寻租理论只是处在暂时的转型期。如果运气好的话,有人将在不远的未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一章中我在一些通常的假设下讨论了寻租成本,这些假设包括管制带来价格上升和使用低效技术。但迄今为止,我并没有对后者做出解释,尽管我指出过,这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普遍。现在让我们转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从本章题目中采用“无知和意识形态”这一说法。

考虑一种有效的转移机制。为了便于解释,我们采用“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这是指将在美国的每一份所得税表上再征收一美元的额外税收,并将最终所得资金付给图洛克,那么它的经济会迅速增长。从政治上分析,大多数人会同意,不管这个方式是否适宜,但这种方案都不可能通过。

让我们来比较“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和“图森降低空气污染方案”。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图森也存在空气污染问题,虽然不是很严重。当它成为一个问题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没有人愿意为此花钱,也不愿意忍受为减少污染所必须带来的不便。这很正常,人们期待的是那些对污染影响很小,但又能令人们感到舒服且花费

不高的方式。

图森降低空气污染方案符合这些特征。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必须了解图森拥有一条受到巨额补贴的公交路线。一部分补贴来自联邦政府,一部分来自图森。因为大量的公交车未充分使用——我在那座城市从来没有看见过满载的公交车,以旅客周转量衡量的交通成本一定非常高。因为公交车大部分时间都在空载,或仅有零散的乘客,比起载有同样人数的小车而言,我认为它们很可能增加了总污染。然而,有三个压力集团支持这一举措:公交车司机、一小部分的确需要乘车的人和那些喜欢这种高尚表示的环境主义者。

图森降低空气污染方案包括将公交线的规模增加一倍,同时还要提交一份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自然被分配到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系,我的两位朋友——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定位地理学者承担了这一报告。对图洛克这一项目的补贴是 3 万美元。当然,研究补助并没有 3 万美元现金,但也没多少不同。我的每个朋友都将得到相应的 3 万美元,而且还将有其他额外的资金用来雇用研究助理和其他雇员,因为我们将会做一些实际的研究。这些钱基本上都会用来购买和补贴更多的公交车运营。

显然,在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和图森降低空气污染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我会偏向前者。但是如果要我自已出 1 万美元来做游说的努力,我则更偏向于选择图森降低空气污染方案。我估计会有 50% 的机会得到 3 万美元作为这个投入 1 万美元项目的收益。投入 1 万美元游说其他人来取得几百万美元的机会如此小,以致贴现值都比图森发展项目的 15 000 美元要低得多。

从经济上说,如果不计寻租成本,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是一种有效的转移,而花同样成本的图森提高空气质量项目则是一个极严

重的错误。然而,我预测图森提高空气质量方案比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取得民主立法机构通过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在农业补贴方案中看到同样的情况。从开始到现在,农业游说团议员就一直有力对抗直接向农场主支付现金的任何提议。^[19]显然,我们可以用付给整个农场主群体数量等于该补贴方案的贴现值的现金,这样无须管制,而且给社会的其他人带来的成本更低。这看起来有点令人困惑。

但解释它却既简单又直接。农场主意识到,这个项目可能太不成熟,因而投票者不会相信。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公共形象”^[20]是寻租者的一个问题。公民在政府的任务与其他的事情上并非一视同仁。在政府向富人进行转移时会有一些掩饰。改变生产技术经常掩盖了真实的目的,比如,提高总产量或者以非直接支付的方式来帮助人们。而直接支付并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例如,民航局(CAB)自始至终都不允许干线运输进入这个行业。假设没有这一规定,政府仅仅在所有的干线航空机票上征税,并将得到的税金付给民航局立法颁布时那些真正在经营的企业。显而易见,无论从航线还是航空旅客的观点来看,这一方式都将优于实际所采用的制度。但是,像“图洛克经济发展方案”那样,它可能不会被国会通过。如果要向这些在三十多岁时进入航空业且具有冒险倾向的企业家提供任何帮助,就必须采用已经被接受的这种低效的方式。

一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私人垄断行业。回顾这些垄断行业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历史十分悠久,几乎没有垄断组织者公开承认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是其目标。他们关心价格的稳定和质量提高,确保在战争时可能用到的产品储备等等。比起由政府主办的垄

断行业,相同的这些口号对私人垄断者影响较小;尽管如此,明显的纯剥削方式也是很少见的。

然而,当我们转向政府和政府管制时,公共利益的这个外衣无论对寻租者还是社会整体而言,都变得更难以看穿,而且代价不菲。因此,回到图 2.1,如果这是一个私人垄断者,左边的寻租三角形将不会接受低效的技术。划线的区域将缩小,为了获得垄断权而投资的带点区域则变大。而当我们考虑的是政府问题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景。

公众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对一般的寻租活动来说几乎是必然的。总的损失大于总的好处,因此,完全知情的人会有更好的策略。而且,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得到好处的人比失利的人要少得多。

互投赞成票是一种使法案通过的方式,这将有利于少数人,而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如果你能够欺骗多数人,将其对手减少到最少,则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在民主体制中,直接从穷的小麦生产者向富的小麦生产者转移支付当然会失败。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欺骗或者隐瞒信息,后者经常用于实施有利于少数群体的法案的微小改动。

普通民众可能不会知道所有的条款,即使对一个重要的法案而言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内容名存实亡。这种手法中的内在风险就是:丑闻能够吸引报纸的注意力,也能引起公民的愤慨。

当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参议员哈特(Hart)刚从总统竞选中退出。此外,一系列关于挪用 1 000 万到 1 200 万美元资助尼加拉瓜的康托斯(Contras)的重大调查也在进行中。从美国政府的日常运作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21],但两者均引起人们的关

注,以致发展为重大的丑闻。为了瞒天过海达到目的,特殊利益集体必须时刻意识到丑闻是可能的。

更常见的是,刻意对方案进行包装设计,使得它至少有一种看上去合理的解释。为此就有必要适用低效率的方式。直接的现金支付通常是帮助利益集团最有效的方式,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一般而言,低效的方式成本可能很高,因为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事情越复杂越隐蔽越好。

自从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22]出版以来,人们就意识到,如果投票者不将政治追求作为一种爱好,一般来说他就很少知情。的确,如果他在阅读报纸时对内容的选择上很理性,他就会“理性无知”。^[23]

最近,另一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投票者投票可能不是被投票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所驱动,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美德等等的感受。^[24]投票者可能违反自己的利益而投票,因为他知道他的投票对选举的实际结果影响甚微。因此,他投这一善举之票,会得到一种道义上的满足,对他而言成本又不高。情感表达性的投票可能比腐败性投票导致更大的浪费。

设想有一名不知情的投票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试图表达投票的道德情操,意识形态在他投票中很重要。不管这一意识形态是否是对19世纪罗马教皇或社会主义经济教谕的热爱,无论如何,这种投票不可能导致高效的政策。

上述的论述有两个反对理由。因为作者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与塞缪尔·佩尔兹曼(Samuel Peltzman),这两个理由一定要引起注意。^[25]贝克尔认为:“……政治上成功的集团的确会吸引新的成员,例如,得到补贴的农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受到补贴

的集团试图阻止其他成员的进入,因为这会稀释既得成员的利益。一种限制进入的方式就是进行游说,使得补贴在新成员进入的情况下不受大的影响。例如,面积的限制比产出的补贴抑制了更少的新农场主……”[26]

但是,就效率和农场主利润而言,对现有农场主的按面积支付或按人头支付都优于面积限制或产出补贴。在一次口头交流上,贝克尔同意了这一点。但他之后的文章可能并不支持上述观点。[27]他对目前方案相对于直接支付法的低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我现在想不出如何用正式的方法来检验我的假说。但是,我相信如果读者稍微思考一下,并考虑国会议员的行为方式和报纸报道政治性活动的方式等等,他就会知道芝加哥习见(被这篇文章认可,且在之前尾注中提到过)可能比在贝克尔文章[28]中提出的新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更有可能正确。

当谈到佩尔兹曼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因为佩尔兹曼从来没有直接说,政府活动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方式。严格说来,他并不否认有许多低效的存在。然而,他的基本观点意味着不存在低效。

佩尔兹曼认为,任何政治交易的结果都是政客势力之间平衡的结果,因此双方都能获益。虽然对日本汽车设定了配额,但是配额不会高到完全限制进口。因而,想购买日本汽车的人不会被完全地剥削的。而且,由于对进口汽车征收的税分散到了汽车生产者上,在生产者得到同样的净利润情况下,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反而更小了。佩尔兹曼没有直接否定这一点。

这里要注意的是,仅仅政治斗争的开始就通常危害到一方或另一方。的确,佩尔兹曼的论断忽视了寻租理论文献的要点。虽然他

没有讨论这点,但我想他会同意:对汽车征收直接税,在日本人收益下降的时候,把这些税金直接支付给这个行业中的人,汽车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都会改进。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和汽车制造商对日本进口汽车施加限制的运动立刻就伤害到美国的汽车购买者。^[29]这一争论最终的结果明显是不利于客户的,而生产商总体实现的利益要大得多。

我们的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第三方参与者。美国汽车生产商、汽车工会以及新汽车潜在购买者仅仅是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还有很多不直接参与的美国投票人。如果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关注此事,他们就会投票。重要的是,他们的做法被包装成多少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形式。配额是一种比直接税和补贴相结合好得多的方式。没有直接卷入这一争论的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争论双方利益集团的人数。因此,很有必要采取一种不要让他们干涉的技术。低效技术就是答案,这再一次证实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我们并没有直接否认佩尔兹曼的观点;我们仅仅是指出,他的模型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这里的问题。

在不同的集团之间会有矛盾,政客就是来平衡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然而,如果存在一位对于某个争论在边际上至关重要的外部人,就必须欺骗他,并让他相信这不仅仅是为了政治恩惠。^[30]

我的观点相当容易理解,客观上也是可以验证的,那就是,为了欺骗投票者,低效技术是必需的。之前我提到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让少数特殊利益的规定写入法案中,以此来掩饰自己不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提到过这种技术的危险。经验研究将足以表明,保密是会失败的,事情总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第二个经验研究中包括了少数的案例,民航局的解散和最近对州际商业委员会(ICC)严厉的限制措施都至少表明了,这些卡特尔组织管理的特征已为人所熟知。德西克和夸克(Derthick and Quirk)^[31]细致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

我将以指出如下这一点来结束本章:虽然我一直认为,低效技术的使用对社会而言非常浪费,但它比起我们在当今的墨西哥所观察到的直接现金支付要节省很多。如果特殊利益立法需要利用非常低效的生产技术,那么投入到寻租业的资源比起其他情况要低得多。因此,有可能是,这种限制特殊利益的立法所产生的总额将远远低于允许直接支付的数额。

不妨考虑另一个例子,一项关于对一些集团成员的直接现金支付的提议,或以超过其机会成本的价格来雇用他们在某处建立水坝。假设有100万美元资金。在第一种情况下,直接将现金支付给他们,第二种情况他们将得到10万美元的净利润,但是却要花90万在建造水坝上,我们假设这水坝是全然无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净损失相等。

但是,尽管社会净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相等,我们所期望的寻租额却大不相同。在一个允许向特殊利益集团直接支付的社会里,很多资源就会用于影响国会。在上述案例中,100万美元和10万美元形成鲜明对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特殊利益立法将被通过。因此,公众要求这些政府的法案引起他们的注意,能够一定程度上符合公众对政府职责的模糊认识,这样他们“歪打正着”了。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类低效有另外一个好处。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是希望改进社会的改革

家。在这一帮助世界的运动中,他们可使用的工具就是从技术上分析不同经济项目的能力。一些项目通过使用低效技术生产,来使利益集团获得特殊利益,这就成为经济学家容易攻击的目标。

显而易见,通过直接现金支付机制,农业补贴方案可以在减少顾客开支的情况下给农场主带来同样多的钱。在政治上,农业补贴方案也是具有破坏性的。的确,这可能就是农场主一直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的原因。

我们前面提到过,普通的投票者经常不知情,但却对丑闻很感兴趣。我们描述过的这一低效率的特征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利用他在专业中所学的工具,将特殊利益集团项目变为一宗丑闻。尽管经济学家——像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那样经常抱怨,直接现金支付机制并没有这种学科上的联系。

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让寻租文献与我们观察到的政府的日常活动更加吻合。我们以如下的见解来结束本章:发生在民主上看似特别低效的特征恰恰可能提高了这一体制的总效率。

注 释

[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51-62.

[2] 这个国会议员因另一宗更大的欺诈被定罪。在这一案子中,依其申述他接受了几百万美元,但是联邦政府所花费的成本却是其好几倍。

[3] *New Deals, The Chrysler Revival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Robert B. Reich and John D. Donahu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pp. 204-205.

[4] *One Billion Dollars of Influence: The Direct Marketing of Politics*, R. Kenneth Godwin (Chatham House, Chatham, N. J., 1989). 这本书提供了政治活动中资金使用的大量数据, 这些钱基本是通过直接邮寄而筹集的。至于个人选举, 不管哪种名头, 总额大大低于 10 亿美元。

[5] 举个关于这些琐碎事情的有趣例子, 参见“Policy Making in Washington: Some Personal Observations”, James C. Miller III,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84), p. 395。碰巧米勒博士友善地读过这篇文章的初稿, 对这一主题十分支持。考虑到他丰富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和政府工作经验, 我认为这是个有力的支持。

[6] 这方面详细的例子, 参见 Gray D. Libecap, “Political Economy of Fuel Oil Cartelization by the 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1933-1972” (August 1977), 未出版。

[7] Libecap, 未出版。

[8] Dennis Muller, *Public Choice II* (第二版草稿), 第 15 章, p. 13。他引证了道格拉斯(Douglas)和米勒(Miller)的文章, 但是这仅是草稿, 引述也不完整。另可参见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Martha Derthick and Paul J. Quirk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1985), pp. 152-153。

[9] 如果是私人垄断, 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 在 1890 年, 分析私人垄断可能会更好。但是, 现在大多数贸易管制都是由政府发起的。

[10] 标准的哈伯格三角形和下面更大的区域并没有用阴影表示。这是为了提高图形的清晰度。我假设读者能够自己辨别。

[11] 参见“Luddism as Cartel Support”, Robert D. Tollison and Gary Anders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December 1986), pp. 727-738。

[12] 由于在这种情形下, 工人们是由竞争性厂商来支付工资的(Tollison and Anderson, 1986), 所有成本最终通过高价格落到消费者身上。

[13] “贫困”这个词是财富的反义词, 传统上认为是约翰·密尔(John Stewart Mill)创造的, 尽管我并不知道确切的出处。令人遗憾的是, 很多经济活动的确产生了贫困而不是财富。

[14] 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Rents and Rent-See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51-62。

[15] 参见 Tollison and Anderson, 1986。

[16]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7] *Toward a Theory of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7-112。这篇文章引起相当多的评论, 主要发表在 *Public Choice* 上。所有的思想交流收集在 *The Public Economy of Rent-Seeking* (1988)。

[18]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 (Fall 1967), pp. 224-232。

[19] 最近, 伪装越来越困难。结果, 现在很多经济学者对目前的一些项目直接支出

印象深刻。对农场主来说幸运的是,很多投票者并不是经济学者。

[20] Rowley, Tollison and Tullock(1988).

[21] 罗斯福总统理所当然地公开和其情人(伪装成秘书)住在白宫,肯尼迪总统也在同一座威严的建筑中进行过频繁的性事。如果他的陪审团接受这个决定,国会议员贝尔吉将把更多的钱转移到威德特克(Wedtech)企业。只有纽约的报纸对此有兴趣,即使是他们的兴趣并不很高。

[22] New York: Harper, 1957.

[23] 也可参见 *Towards a Mathematics of Politics*, Gordon Tullock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pp. 110-128.

[24] 这个观点最早见 Gordon Tullock 的“Charity of the Uncharitable”,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9 (Dec. 1971), pp. 379-392。详细的论述见 Geoffery Brennan and James Buchanan, “Voter Choice, Evaluation Political Alternativ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Vol. 29 (Nov. / Dec. 1984), pp. 185-201。最近,安德森(Gray Anderson)和托利森(Robert D. Tollison)在还未发表的实证中对此提出了很多疑问。

[25] 参见“Public Policies, Pressure Group, and Dead Weight Costs”, Gray S. Beck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28 (1985), pp. 329-347。被广泛援引的文章是 Samuel Peltzman,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6. 8)。

[26] Becker, 1985, p. 342.

[27] 可能他利用农业的例子最根本的理由仅仅是,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认为农业补贴项目是低效的,而直接现金支付会更好,这在芝加哥大学成为口头文化的一部分。

[28] Becker (1985, p. 342).

[29] 这也伤害到一些日本汽车生产企业,但却有利于一些其他企业,我们暂时搁置这一讨论。无论如何,在美国选举中,他们是不会投票的。

[30] 在一些情况下,普通公众认为政治恩惠之争也是情有可原的,尽管谈不上高尚。别的官员都在他们的辖区修建水坝,我也应该在我的辖区修建水坝,人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如今公正可以采取每个人都分得一点惠利的形式。

[31] Drthick and Quirk (1985).

第三章 寻租成本：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之所以会为诸如保护性关税、农业补贴方案等项目进行投票，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认为这些项目会吸引投票。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反对这些项目，因为他们认为这有损投票者。从技术上说，投票者使投票分化，也就是将他们全部的偏好函数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他们认为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其他将精力集中在别的问题上的投票者则不考虑上面这些投票者的福利。

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投票者都没有分化其投票，那么所有的投票者的福利就会更糟。另一方面，民主赋予了投票者选择权，而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去投票。投票者就是为此而进行投票。难道我们也把这个当作成本吗？

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投票者有可能信息不灵通。的确，任何一个“公共选择”的学者都可以让学生们证明：那些理性的投票者将决定不去了解很多信息，除非他碰巧将政治当做爱好。

作为这里一个比较困难的例子，考虑以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话：“赤字的‘问题’使得决策可以为人所知，并尽可能地对公众的愿望做出反应。”^[1]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公众整体上都是不知情的，这两个标准就不一致了。而且，公众的确整体上都是不知情的。

个人做出外人看来似乎不明智选择的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选择会给决策者带来成本吗？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在经济上

和政治上都是很难回答的；所幸的是，在经济中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试图衡量寻租成本，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是国会议员对农业补贴方案投赞成票而得到的最主要的收益；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人们会投桃报李。难道这是成本吗？

我们离点题讨论一下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私人市场的成本。假设在两百年前，有个生病的人去看医生，并要求放血。医生用了一把当天给 8 到 10 个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放过血的手术刀去给他放血。医生没有给刀消毒，因为他从未听说过细菌。即使不考虑细菌问题，不管他得了什么病，放血其实是一种通常使得病人病情加剧的做法。这其中有什么成本吗？以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判断，放血显然是病人的一种错误的决定。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我们假设在 130 年而非 200 年之前，很多医生和病人开始认识到放血并不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假如一个传统的病人和医生达成了一个双方认可的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医生为病人放血，还是用没有消过毒的刀。对病人来说这是施加了“成本”吗？

这些问题对学习市场的人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但当我们转向寻租时，它们就很重要了。举个例子，其中人们都是知情者，但是却存在外部性。设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一位司机知道开汽车会对空气造成污染，那时没有什么管制。他也知道如果停止污染，尽管对社会上其他人——当然也包括自己——来说会稍好一点，但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既然成本都落到他身上，而自身获益又很微小，他不会选择放弃开车。即使这一行为带给整个社会的收益远高于他的个人的成本，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通常会说，他给社会带来了成本，应该实施某些社会制度来迫使他停止对社会

的污染,或者至少要全额补偿给社会带来的成本。

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例子,它更接近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假设社会计划限制空气污染物,干洗企业组织起来行动,试图将来在法案中能够免除限污的责任。他们和各种其他不同的压力集团交涉,说服其为赞同限制日本汽车进口、农业补贴方案等项目的议员投票。结果,他们的免责条款被写入了法案,然而空气污染水平比起其他情况下更严重了。这也算成本吗?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下面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寻租靠的就是这种伎俩,在试图衡量寻租成本的时候,这是否是寻租成本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假设我们拥有完全信息,并且能够查知寻租的所有影响(如,导致农业补贴方案得以通过)。我们发现一部分非农场主的信息不灵对这个计划也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无知而没有对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农场主利用其影响顺利通过方案。在这些因素中,90%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素导致了计划被通过。还有一些竞选献金、宴请妇女团体、可能的贿赂,但是这些加起来也不及直接因素的10%。我们要把这90%包括到寻租成本中吗?

设想我们有一个在高中公民教科书中描述的政治体制:投票者是根据国家的利益来投票的。根据这些教科书,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投票人缺乏系统性信息,即使为了国家利益去投票,往往会选择不当的政策。如果我们考虑的是如下更切合现实的情况:人们的投票是利己的(如农业补贴方案),那么结果一定会不同——尽管未必会比为“公共利益”投票更糟。

作为驻外事务处的前官员和一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我对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政策非常关心。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政策是由部分投票者的私利所驱动的。例如,援助计划曾经使得美国火车机车

业生存下来。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很多政策并不是什么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推动的。

我们对外国民主政治的模糊的期望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方面,很多美国人认为民主的外国政府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是符合伦理的,却丝毫不觉得这种认识有多荒谬。然而,显然这是有原因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2]一书中,将美国的政策描述为“伦理帝国主义”,即美国试图将其伦理体系加给整个世界。这的确是大部分美国人期望的,尽管他们大都不愿承认。这样的目标对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倒没有多少私利可言。

这里的要点是,经过对这个问题的长期研究之后我认为,那些(无知地)追求公众利益的政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体目标带来的损害要比寻租带来的损害更大。

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国内事务。在国内事务中,如果投票人想参与公共品的决策,他们通常不明就里;如果寻租者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往往也信息不灵,对问题也欠思考。但事情往往是,实际的政策会更倾向于维护他们的私利,“符合公利”的政策并不多见。

我们还不清楚投票者利益分化的利弊。利益分化带来的损害可能不像推行社会公利带来的损害那样大。

另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实现了特殊利益对社会是有好处的。我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文章^[3]就讨论了道路修护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道路修护给居民带来的好处要超过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即由于某个原因,一个小的群体难以提供一些对他们都有好处的东西,尽管提供的社会成本小于给这个小群体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建议社会来提供这些物品,因为

我们都会经常处于类似的小群体情形中。

问题在于，小群体会谋求那些对他们甚少好处的事物，而对其他人带来的损害却很大。但不幸的是，这些寻租者往往能够得逞。

向其他民族推行我们的伦理体系往往会事与愿违。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是威尔逊政府早期的国务卿。他当时积极的中国政策的目标是对中国快速皈依基督教不加以干预，当时他认为这种变化正在发生。的确，他不仅不加以干预，而且乐观其成。这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推动的政策；它至少是无害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是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引起的，当时他为了使美国银行家^[4]获得特权而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5]为了做这些事情，他耽误了一些重要的铁路建设。这一耽误通过一系列间接的机制，诱发了中国的革命，就像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诱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所有的这些讨论都是一般性的，我们不妨进行一点稍微正式的分析。为此目的，假设某人生产了一台万能计算机，它知道每个人的效用并且能计算最大化该效用的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6]

从私人购买开始，假设这台计算机负责个人购买，它能够指导人们购买效用最大化的产品。例如，要是在1776年，这台计算机就不会建议人们去放血。假设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拥有完全信息，但对其自身的效用函数却知之甚少，那么和他做出的决定相比，去放血看上去就有点荒谬了；但是你会去购买你认为喜欢的东西，结果却发现并不是这样。计算机就不会出这样的错。

因此，即使每次在购买前，购买者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调研，即使这些时间都是没有成本的，但还是不如计算机做得好。实际上，

这台计算机优于任何人工手段，因为它知道那些尚未知晓的东西。当然，现实中个人并不是很了解其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他基本上是靠别人来做出很多最初的决定的。

我从专门为像我这样的上流人士生产衣服的商店购买衣服，但离那些最高收入层的人还有很大距离。在买衣服的时候，我想首先，光顾这些店的顾客起码会判断价格和质量；其次，店主在满足顾客需求来赚钱方面也做得不错。

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搭了其他顾客的便车，而其他人也同样搭了我的便车。如果将这个话题转向医疗、选举机制等，我掌握的知识就更不及那台超级计算机了。

边沁(Bentham)认为，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应该让个人来做决定，不是因为这些决定必然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和我们设计的其他机制做出的决定相比，这会更符合其效用。换言之，他认为不存在那台超级计算机。既然这仅仅是虚构的情节，我与他没有异议。因此，让人们做出这类决策可能就是明智的。的确，我们可以将充满这类决策的社会称为“最优”，而不是指毫无意义的“最优”这个词。那些指出顾客们经常是不知情者的市场体制批评者是正确的。但一旦我们离开市场，信息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虽然并非广为人知，市场给个人提供了有利于他人的机会。人们可以向美国癌症协会、乔治·梅森大学，或大街上的乞丐捐赠或施舍。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下，你可以说他们是在购买一种通过利他带来的满足感，这里的信息可能也是不完备的。^[7]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比直接购买的相关信息可能更不完备，因为，购买这种满足感的人并没有直接从馈赠物中受益或者受损。

在这里，边沁还是会说，他应该做出馈赠的决定，选择任何他认

为合理的建议^[8],我当然也无异议。

到目前,我们一直在比较计算机做出的决定和在市场环境中个人做出的决定。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外部性。但是,当我们这里要讨论到政府、特别是民主政府的时候,外部性就变得很重要了。毕竟,外部性的存在是我们需要政府的根本原因;当讨论市场的时候,可以将其抛在一边。政府就应该来解决外部性,尽管研究政府实际运行的人知道:它们导致的外部性比起它们消除的外部性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转到我们的那台完美的计算机,假设它要处理由于外部性而必须要集体决策的问题。这台无所不知且从来不出计算差错的计算机决定那些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做多少。当然,我们万能的计算机也可以按照收益的比例在纳税人之间来分配政府活动的成本,但我们这里假设它不能这样做——它使用的是普通税。结果可能是,一些人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计算机所做的就是确定总效用超过总损失。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计算机是我们虚构的。

投票者的真实行为有可能偏离这种理想的模式,原因有两个:(1)他们不具备完全信息,也不是万能的计算机;(2)即使总成本高于总收益,个人将会偏好有利于他们的事情。我们来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先从信息开始。

如前所述,在“公共选择”文献上很早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个人常常是不谙政治事务的,特别是对那些公共事务。单单是信息问题,就足以使得个人决策与我们前面的计算机决策相去万里。

信息不灵未必意味着缺少计算。我们的计算机不仅能运行完美的计算,还可以知道其他人的效用,这是普通投票者所不知道的。

比起公共事务,事关投票者利益的事务更能够引起投票者的关

注和了解。说“他更了解”与说“他非常了解”是迥然不同的。这里公共品意味着,作为成千上万人群中的一份子得到的收益甚小,他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信息。实际上,如果他很了解,那很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他为了经营自己的农场需要了解技术性的知识而去翻阅农业杂志,随便了解了有关的政治信息。

当我们谈到个人对其他人效用的了解时,情况就更糟了。首先,他不会关心其他人是否得益;其次,即使他想帮助别人(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如此),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切实地帮助。例如,如果我们去看旨在帮助穷人的方案,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设计方案的人认为穷人的决策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形下,实物援助和对援助对象生活的管束是司空见惯的。在某种程度上,有慈善倾向的人更像我们那台强大的计算机,试图去帮助人们,但往往非他们所需。

从大的方面来看,糟糕的信息有可能对社会有利。个人对公共行为可能有一套未经缜密考虑的道德准则,当他听到政府做了某些他反对的事情的时候,这些道德准则会影响到他的投票行为。关于盗用资金的丑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特别地,有利于少数集团的财政转移或特殊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以欺骗的方式存在,这降低了它们的效率。然而,效率的缺乏却有直接的好处,它减少了这些活动的利润,因此,也降低了那些寻租者试图获得租金的努力。

另一方面,欠经缜密考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任何试图推行重大政府改革的人都知道简单的欠考虑的反对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普通投票人是按照道德标准进行行动的,所以他会接受对政府的道德上的批评;而且事实上,他认为政府应该更符合道德。但是,由于他考虑不深或者缺乏信息,任何试图说服他是政治体制有问题

的尝试都会遭到他的抵制。

第二个问题是，与我们的机器不同，个人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他人。再强调一次，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人们对帮助国家、穷人和那些患癌症的人等等有一定的关心，但这种关心一般而言要小于他对自己和家庭的关心。

如果没有外部性问题，而且政治上的外部性通常以向人们征税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个人根据什么对他们有利来决策，而且可以认为，那些通过多数票的问题（不管是通过直接投票还是通过互投赞成票的方式）总体上是有利的。尽管它们不如我们前面的计算机设计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差很多。

当然，遗憾的是，政治活动充满了外部性。例如，纺织工人争取对纺织品的进口征收关税的决定明显地会产生外部成本。

不妨设想如下情景：民主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一套保护性的关税。我们常常说这样的关税代价很高，因为它们不同于投票人都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投票通过的方案。但是它们真的是代价很高吗？我的初衷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的是，美国的政客从寻租团体那里得到的主要好处不是盛宴或者直接的现金，而是采取了集中投票的形式。拥有相当规模投票人的利益集团只根据他们的国会议员是否支持对棉纺织品开征关税等进行投票，而不考虑其他因素，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了损害，但是，我们能说这种投票代价高昂吗？

在民主国家，政府应该是被投票控制的。如果投票者所投的东西不符合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能够说这是成本吗？

我们能追随边沁式的看法，认为公众的判断比这里任何其他的判断都好吗？请再次注意，边沁的判断并没有涉及任何公众判断是

正确的讨论,但却论及个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效用。还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边沁也会被棉纺织品关税所吓倒。

整个问题开始转向更深层次的形而上观点,即政府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是一个内化外部性的组织。政府的存在比起没有政府的情形,会带给我们更高的满意度。从这个角度看,棉纺织品关税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也许会认为,即使政府对纺织品实施了关税,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很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棉纺织品关税就是错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还有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人们的选择会如愿以偿,棉纺织品关税就是正确和合意的。再设想以下的情景:如果投票者不再根据自己的利益投票,而开始根据公众利益投票,那么他们了解信息的积极性就会很低;因此,他们的决策与公共利益几乎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这样一来,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

我加上最后的一个困难,并把它留给读者们思考。即,压力集团经常精心地在投票者中散布错误信息。因此,一项管制的设计只会使得某一产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这个产业中的另外的人则受损;但是兜售这项管制的人的论调是,它将使“整个产业”受益。例如,农业调整署(AAA)在20世纪30年代设立的时候,它有利于农业地的所有者,却伤害了农业上的雇佣劳动力。我猜想,很多雇佣劳动力赞成为这一法案投票的国会议员,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会对“整个农业”有好处。毫无疑问,他们被农业游说集团的宣传误导了。

然而,这是在集团内部,集团外部也会有这种错误的信息。例如,在公民中较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保护性关税不仅有利于被保

护的产业,也有利于每个人。设想某人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为了自认为有利他的事情而投票,但事实并不如此。这算“成本”吗?再设想某个公民和棉纺织业唯一的关联就是购买衣服,他确信国会议员为了保护性关税投票至少没有伤害到他,可能还有利于他。这是“成本”吗?

这里的问题是,人们这些考虑不周的观点到底应该赋予多少权重?对私人决策赋予绝对的权重不仅符合边沁的观点,而且实际上几乎得到了所有经济学家的支持。对公共决策来说,对个人权重的看法没有这么强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并不反对人们以自利的方式来做出市场决策。在政府决策中,这一点并不明显。但是,似乎我们也应该给予同样的考虑。

我将本章加了“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个副标题。“形而上学”在这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而言的,而是指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对分析寻租来说。这篇文章当然没有解决它,我能做到抛砖引玉吗?

注 释

[1] Herbert Stein, “Balancing the Budget Compared with What?” *AEI Economics* (February 1987).

[2]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42.

[3] “Problem of Majority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7 (December 1959), pp. 571-579.

[4] 银行并不需要他这样做。

[5] 这个建议来自误读经济的美国国务院。

[6] 我们不必担心人际效用的比较问题,科学幻想毕竟只是科学幻想。

[7] 参见“Information Without Profit”, *Papers on Non-Market Decision Making*, Vol. 1 (Charlottesville, VA: 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1966), pp. 141-159.

[8] 我认识一位富人,他的基金会向专业桥牌锦标赛提供资金。我认为这纯粹是浪费金钱,但他并不这样认为。按照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规定,这是慈善捐款。

第四章 有效寻租、规模不经济、公共品和道德

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本章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就是,规模不经济或公共品的可能性。我将这一讨论推迟到这里,因为这两点都不能解释用来转移资源的技术的低效性。同样,如果要采用这些解释,就必须假定一些重要的参数。尽管如此,这些解释却可以用来补充前两章的解释。

在我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不为众多经济学家所知的解释。以前,我写了一篇题为《有效寻租》的文章^[1],探讨了一开始就有的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的情况。换言之,成本曲线并不是U形,它既不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持续下降,也不随着规模扩大而上升。由于这篇文章的结论令人费解,所以这篇文章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

我们这里只讨论那篇文章中的规模不经济这一部分。随着单个企业规模的下降,投资收益百分比会上升。随着单个企业规模越变越小,收益率通常是正的,进入会持续发生。在这个过程的极限处,还存在有待实现的利润。换言之,在这个模型的均衡状态,如果说有均衡的话,那么市场也是不出清的:投资总额远低于总收益。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行业表面的投资不足,即寻租业规模偏小,那么这一模型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本章感兴趣的现象。然而,要得到我们在游说市场上看到的开支和收益相去甚远的结论,规模不

经济就必须非常严重。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这种规模不经济,我们就会预期这个行业的进入者规模肯定很小。250 个规模很小的游说团去争取钢铁行业的利益比起 25 个小规模的游说团要更为明智,更优于一个相当大的游说团。但我们并没有观察到游说业的极端细碎化。实际的运作恰恰相反,每个特殊利益集团都在华盛顿有单一的组织。

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不会有 U 形成本曲线:当游说团规模很小时下降而随着游说团规模变大时上升。可以想见,设在华盛顿的所有游说团都处于这种 U 形成本曲线的规模不经济部分,有效规模将在曲线的较低点。

然而,这种规模不经济无助于说明问题,因为,假设每个游说团存在一个很小的最优规模,那么单单将这些众多的小游说团加起来,也会得到一个相当大的产业。要使规模不经济能够解释寻租业的实际规模和人们设想的规模的差别,整个产业上一定存在某种规模不经济,即各个游说团体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互相干涉,游说团体相互之间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在立法领域,这种解释是很难成立的。大致上,国会通过的法案和官僚机构颁布的规章在总量上会有一个上界,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寻租团体的总数。不妨设想,可以通过的法案的总数为 10 万,对那些争取法案通过的团体来说,每个法案价值 100 万美元,而一个最佳规模的团体付出的成本只有 10 万美元。这将导致有一百万个 10 万成本的游说团,其中每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得到百万美元的收益。在游说上的总投资和总收益是相等的。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2],游说和购买彩票有相同之处。

这里规模不经济的程度既奇怪又很强。情况一定是这样：当游说团体超过一定的数量时，增加一个新的游说团体带来的净收益就是负的。现有游说团体的扩张所带来的收益也是负的。甚至表面上看到的游说努力和收益的不均等，也反映出高度的整体规模不经济和负外部性。虽然我不愿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似乎不合理。

再转向公共品现象。甚至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品和集团理论》开始^[3]，我们就已经知道，压力集团的确为他们的产业提供了公共品。这很自然地引出了组织问题。那些拒绝向钢铁游说团捐款的钢铁厂，和向游说团捐款的钢铁厂一样，从对韩国钢铁的进口限制中获益，因此，在这种游说活动中会存在投资不足现象。我们试图解释的并不是由特殊利益进行的投资比最优投资少这个现象，而是这种投资似乎比得到的收益少得多。

我来虚构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拥有 100 家同样规模企业的行业，并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优惠，如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保护性关税。假如关税水平是游说团体投资额的增函数，即投资额越高，关税水平越高。而且，进一步假设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最优的关税水平需要的投资额为 500 美元，即 100 家企业每家投资 5 美元。

如果一家企业决定投资 1 美元，让其他企业搭便车，就会有一定的保护性关税。它自己大约只能得到关税保护所产生利益的 1%，因此游说的总价值是投资的企业所得到收益的 100 倍。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似乎还不错，但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数字是极端不成比例的。由这一家企业投资的 1 美元几乎提供了价值 500 美元的公共品的 20%。这样，在每一额外投资的美元上带来的收益必然快速递减。尽管，我的确不想说这些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非常接近了。

当然,不可能的仅仅是数字的规模。但是,这些数字看上去和我们在游说业中实际观察到的数字相差不大。花在游说上的实际投资与对其经济造成的净成本之比足够大,所以第一单位的投资收益必须很高,然后递减。这样的话才可以用公共品理论来解释。

顺带说一点技术性方面的内容:可能存在不连续性。我们假设行业中第一个购买公共品的成员对它有特殊需要,购买数量如此之多,以致剩下的行业成员即使能够集体行动也不愿再使投资达到行业最优水平。换言之,虽然行业中 100 家企业每家投资 5 美元,比大家都不投资要好,但是当其中一家企业投资 1 美元(这里假设企业把 4 美元也加进投资)时,其他 99 家企业每个投资 5 美元就不如搭投资 1 美元企业的便车了。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是极端的是数字。

然而,如果前面两章或其中任何一章的讨论被接受,那么规模不经济和公共品这两种解释就可能是对它们的补充。第二章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得到的全部利益比其对经济造成的成本要少得多。第三章的基本观点是,政客制定法律的激励就是能获得再当选。换言之,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投票者,而不是那些说客。如果这些观点被接受,那么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和公共品的解释就不困难了。

这也符合我最后提出的可能的解释:人们可能认为寻租是不道德的,所以不去从事它,这与前两章的解释也是互补的。尽管我没有必要将寻租看做是高尚的事情,也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道德的考虑在这里能有多大作用。但仍然有一些人对寻租存在道德反感,这减少了寻租的数量。

因此,我所讨论的这些针对寻租业规模小的解释,可能都是对的。其中有些解释可能是错的,有些解释我可能还没有想到。

这是个切实而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更具体的是在斯密和李嘉图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19 世纪有过一段太平时期,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 20 世纪特权的部分复苏对财富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和导致特权蔓延的政治动机是很重要的。

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旨在解释如下困惑:阻碍经济发展的寻租业的规模比其实际产生的影响看上去小得多。本书后面的内容将与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希望读者也会对其感兴趣。

注 释

[1]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这篇文章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大多数发表于《公共选择》杂志上。1987 年前的一部分讨论重新发表于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2] “The Welfare Costs of Monopoly, Tariff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 (1957, 6), pp. 224-232.

[3]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ory of Groups*, Mancur Ol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二部分

关于寻租的随想

第五章 寻租：定义问题

不久前,我给一篇文章做评论,该文认为目前的专利申请程序导致了寻租。作者的观点是,因为专利是一种垄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垄断,相当多的人会从事专利申请,这会导致重复性研究和浪费。浪费的结果基本上是,科学进展“太快了”。

大多数人认为科学进展不可能太快,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却不同意。大多数的资源有可能被投资到就其自身来说最合意的地方,这是经济学提供的洞见之一。但是,在专利的情况下,由于竞争性的科研,居然还有可能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因此,浪费可以任何一种形式出现:既有可能出现投资过度,也有可能出现投资不足。

为了理解科研的速度怎么会低于社会合意的水平,不妨假设有一些人认为某些专利是合意的,并为了得到专利而从事研究。然而,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不止他一个人在从事研究,因此,仅有一些人可能得到专利,而未必一定得到。再假设三个人每人都感到,即使他尽可能地迅速工作,他也仅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成为最快的人。

在这些情况下,他可能只计划投入专利真正价值的三分之一或更少的资源。这三个人都会对研究进行保密。因此,重复现象在所难免了,即参与竞争的人实际上都在进行同样的实验和测试等活动。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浪费了。

尽管大致说来,参与研究的人的投资将不大于专利的价值,但

其中很多投资是重复性的,因而,知识的总量就会比所有资源都被配置到一个研究者那里要少得多,因为在后面的情况下,他的投资将等于整个专利的价值。科学研究进展可以太慢也可以太快。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花费的成本不少于有效配置下的成本额,但是产生的知识却少得多。

这和寻租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送给我这篇文章的同事认为这是寻租的一个案例。的确,它看上去有些相似。^[1]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于专利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却没有给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个人是专利的支持者^[2],但我必须承认,这两种情况是有相似之处的。

与寻租相似的不仅限于专利。考虑到推销产品的生产商所付出的努力,不管以广告形式,还是仅仅提供一个舒适的购买环境。^[3]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往往是自相抵消的,这和重复其他人的秘密研究是一样的。

举这一领域的一个例子,州际公路广告牌最近有了变化。以前它们大而显著,由于立法限制,现在它们成了相当小的饰板,被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安置在信息板上。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理想的法案,但也毫不怀疑这是个改进。广告牌上同样的信息现在以更低的成本出现,无论对广告者还是能欣赏不受阻碍的风景的司机而言都是有益的。

我们并不清楚,上面促销或者发明例子中付出的努力是否是真的浪费,因为有可能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不能再改进了。在促销的例子中,我认为情况是可以改进的。对广告征高额的税就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资金,且实际上对做广告者本身没有成本,因为每个人的广告都被同样多地削减了。在电视上禁播酒精类饮料和香

烟的广告经历似乎表明,这些产品的生产商本身很乐于达成卡特尔来减少在广告上的总投资。就我知道的而言,那些以前在高速路边竖广告牌的人对现在的限制很满意,他们仅需要将广告展示在由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安置的大型信箱板上。

对广告征税要被通过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社会中影响巨大的媒体会反对这种大幅减少其收入的行为。我们不知道,媒体在从做广告者那里得到的支持部分转变为消费者支持的时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获益了还是受损了。但读者确实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另一方面,政府将有可观的收入来源。

这里就是定义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将竞争性研究、竞争性促销等都视同寻租吗?

设想我们得到了神圣的指引:我们对一些具体的交易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假设我们调查一件简单的销售事件(而不是发明),其中许多人都在销售基本上相同的肥皂品牌。注意到,我说的是“基本上相同”。当然,技术进步发生在肥皂的制造阶段,但广告和销售过程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我认为,广告的一个非常小的好处是加速了生产的技术革新。^[4]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神圣的知识来对成本做出判断。首先,肥皂的生产成本;其次,以最小成本配送货物的成本;再次,告知肥皂购买者有这个品牌而且它又可能优于其他品牌的成本。肥皂在“好看”的盒子中被出售和在超市的供给也应该算作实际成本。

我们的神圣知识将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顾客的福利一样好,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同样快。如果不同的肥皂生产商在广告等方面必须去遵循最优协调政策等,那么总成本会降低。但是,政策的协调也需要神圣的知识,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优政策。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设计出一个可能的人为协调方案,并查明这是否比现有体系成本更低。毫无疑问,这种协调方案肯定是存在的,尽管这个方案可能遇到这样的事实:没有人有激励去真正实施它。而且,人们有很多动机去设计一个精巧程度不同的方案,比如去组成行业卡特尔。

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在肥皂业做广告的人们,都试图制造垄断竞争收益,这有点类似建立正式的卡特尔或得到政府管制。我们能把这称为寻租吗?

读者可能已经推测出我的回答是“不”。但我想要的是某种连续方程,其中竞争的成本和利润相互抵消,这与垄断竞争是不同的。为此,我们的神圣知识,即知道在如下理想设计的程序下发生的一切(在这个程序下,一个超级计算机不仅知道,而且还能够预测消费者的愿望),就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假设,尽管未必多有用。

为了表明这里存在的困难,不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假日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口述了这一章。浴室里有一张经理写的便条:“如果您忘记带或是需要必备的卫生用品(剃须膏、剃刀、梳子、牙刷和牙膏),请致电前台,我们将立刻为您补充一套用品。”

酒店的管理层之所以这样做,未必是因为他们认为顾客就是那些值得被帮助的好人。他们其实是认为,将来我可能会更愿意光顾这家假日酒店,而不是其他酒店,因此他们在试图进行垄断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提供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是很难在全国做广告的,其他酒店也会这样做的。人们几乎只有通过个人经历或者口碑来了解另外一家酒店是否也这样做。

这种方便顾客的行为也是一种竞争的手段。通过提供这种服

务(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是由顾客来付费的),它们和其他酒店之间的竞争刚性会减缓吗?顾客会为了酒店的设备支付高于意愿的费用吗?我不知道,也想不出一个计算的方法。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测定竞争成本,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顾客是喜欢这种服务,还是更喜欢其账单金额的微小减免。

在竞争中,其他酒店可能也会如法炮制。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将来某一天这种服务在所有酒店(除了最便宜的那些以外)会很普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酒店管理层也没有合适的激励或能力来判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可能回答得比我更好。

我们来考察专利的例子。例如,假设有一项潜在的新发明如果能做出来,而且设计者获得了这个发明的垄断权,那么它的价值为100万美元。这项发明当前需要解决12个问题,假设我们对每个问题的解决成本前期估计是1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人们参与这项发明的研究不是合意的。也许从社会角度来看,这项发明是合意的,因为对发明结果的竞争性应用的价值会高于垄断性应用,但我们暂不考虑这一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在进步。假设不久这12个问题中的2个已被解决。这里,我们不妨假设某位研究者做出了这样发明。也可以设想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从事这一研究,并最终有一家得到专利。假设解决每个问题的确花费了10万美元的成本,而仅仅是由于速度问题,A企业花了100万美元来获得价值100万美元的专利,B和C企业各花了80万美元解决了8个问题,但却没有获得专利。这里的社会损失似乎相当高。

现在假设A、B、C企业没有从事这一研究,而是想:“如果我们

开始研究,至少其他两家企业也会开始行动。他们的科学家和我们的一样出色。我们可能并不能赢得这一竞争,除非在三者中领先,所以我们的实验室要一直等到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才开展这一项目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三家企业都会等着其他问题被别的企业解决的时候,三家实验室才开始工作。其中一家将会打败其他两家,在投资 30 万美元下得到价值 100 万美元的收益。另外两家企业也可能投资了 30 万美元,但晚了一步就没有拿到专利。因此,我们拥有了社会需要的发明,但是却晚于社会最优时机。而且,这一发明还取决于其他地方碰巧发现的有用知识。

从社会观点来看,如下的情景显然是合意的:两个外部实验刚完成的时候就立马开始研究,只让一家企业从事研究,而且让它很快就实现这项发明。这里我们发现了如下的情形:看上去,竞争导致了糟糕的结果。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是寻租导致了坏的结果;毕竟专利带来的收益是一种租金。

考虑一下哪种制度结构将会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诚然,如果假设存在这样的政府机构:它们信息灵通且工作努力,对发明时机的把握一贯正确,并交给合适的企业去做;这样,在假设政府不花成本或很小成本的情况下,政府就能比市场做得更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飞机制造业就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与美国飞机制造商竞争。他们的产品之一“协和”飞机,今天还在天上飞。但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灾难式的教训。

事实上,政府官员们并不善于做这种猜想,他们也不可能做好。他们不受私人市场对研究组织的那种约束,无论如何,新发明被任何一个人垄断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很多人从事科学研究,所有的人都用其选择的方式来独立推进他们乐意的事情,那么就会进行得

很好。在这方面，苏联的科学界是典型的例子，法国也差不多。实际上，俄国人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比美国更多，但因为他们是中央计划体制，所以取得的进展很小。在那里，这意味着，实验室中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钻中央计划体制的空子，而只有第二层的人在从事实际研究。

上述内容绝不是说，竞争性市场（不管是推销酒店客房还是发明创造的市场）是没有浪费的。我甚至推荐一种对广告征税的改革。但很难设想有哪种制度能运行得比现存制度更好。我们鼓励人们去寻找做企业家的机会并努力工作，当成本收益对比变为负值时则放弃它们。即使竞争有其缺点，但它仍然比没有竞争要好。

即使是为政府的优惠而展开的竞争，也是如此。通常，政府不是天然就来做好事的，必须有激励来诱导它做好事。例如，每一条州际高速公路的建设伴随着大量的事务，高速公路应该建在哪里，又在哪些地方设置出口都是待定的问题。巨大的私人投资都是为了影响关于这些问题的决策。我猜测这些投资实际上并没有超过服务本身的价值。但通过这些基本上能够看出，比起政府实现计划好的情形，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做得更好。的确，政府的所有决定都是不同人参与影响的结果。

旨在对政府的行动进行规划由政府计划局是难以设立的。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事情：给最优的人员以最优（不会是完美的）激励。

这就引出了我对寻租的定义。不是拿项目的全部成本（包括销售和制造成本），与其收益相比较，我有更恰当的建议。很明显，全部成本是理想的，但是做不到。我的建议是单独用“寻租”（我经常这样做）来表示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事情，不管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考虑一件一目了然的例子。假设一家处于困境的钢铁制造企业(目前很多钢铁企业都如此)要在两种做法之间进行选择,这两种做法花费的成本是相同的;而且按照专家的观点,这两种做法成功的概率是相同的,从而对其利润的影响也是相同的。第一种做法是,花费巨资游说政府使其禁止从韩国进口钢铁,借口为这种钢铁危害环境。结果,钢铁的价格就会上涨,大部分美国人的福利会下降(这里我假定他们对韩国钢铁危害环境的指责是虚假的)。

另一种做法是引入一些提高效率的新的机器设备,这样多赚的利润与第一种做法一样多。这样会导致一定的垄断力量,因为它的成本将会低于它的竞争对手。显然,这样做对社会造成的净效应是,钢铁的成本降低了一些,大部分人的福利会得到改进。不消说,它的竞争对手的福利没有得到改进。我认为,第一种情形是“寻租”,第二种情形不是“寻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如下事实:竞争也会有成本,而且企业会损害其竞争对手。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不能提出更好的定义了。通常经济学家能够识别那些就其本身来说有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我们却不能识别那些就其本身来说有益,但是通过竞争过程产生大量成本的制度。当然,我们经常能够识别那些浪费性的支出。在发明的例子中,那些付出过努力、但是被竞争对手打败的人的支出就浪费了,因为这些支出没有任何正的产出。

从社会角度而言,激励人们在比赛中竞争可能是件好事,即使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失败。在永恒状态下,如果我们能事先挑选出获胜者,并让他努力工作(在发明的例子中,让他更早地开始工作),世界毫无疑问将变得更好。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些例子的共同特点是: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手段,我们的福利将得到改

进。如果我们能飞,那自然会更方便。但是,我们找不到这种情景,而且也不能衡量资源的“浪费”。所以,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研究下面情形下的寻租:它创造的制度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合意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寻租就很明显了。寻租本身浪费了资源,寻租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也有成本。如果将我们的研究限定在这种问题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处理寻租问题了,而不只是在做乌托邦式的梦。

注 释

[1] 注意本章自始至终都忽视了从我的“有效寻租”理论开始的一系列文章所提出的数学困难。

[2] 参见“Intellecture Property”, G. Tullock, in *Direct Protection of Innovation*, William Kingston (ed.)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pp. 171-200; *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3] 昂贵的餐厅的确提供出众的食物,但是人们更多的支出花在了周围的环境上。

[4] 很多时候,肥皂改变了,但是技术含量没有任何改变,做广告的企业却宣称技术上有了改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的确会影响技术改进,尽管不是很大。

第六章 寻租和市场

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寻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子学科而发展起来的,与常规的关于市场的微观经济学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这并非批评,因为寻租研究的基本是非市场行为或者是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合意的市场活动。一般而言,寻租理论加强了主流经济学家早期反对垄断和其他特权的规范理论,虽然依据的是不同的原因。尽管如此,将两个领域直接联系起来还是有益的。

本章的目的就是建立这种联系。但也不会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将从不同的假设中,重新推出每本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相同结论。视角的改变至少对某些经济学家会有点启发,但从根本上说我的意图是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对任何经济学或寻租理论做出新的贡献。

寻租是那些了解经济学并将其思想用于这个子领域的人开创的。也许其他方式也同样可以催生寻租理论。例如,寻租可以作为经济学的第一部分;它的洞见可以作为经济学其他部分的基础。即便这种倒过来的做法不重要,但它确实代表了我们的推理中那个应该被糊起来的小漏洞。

这一章我主要采取的是在我早期文章《有效寻租》^[1]中的一种框架,补充的部分参见我的文章《重陷泥沼》。^[2]我假定读者已经读过这部分内容,但不需要读者准确地记住内容。

回顾一下,这些文章一开始都指出,并没有明显的原因表明寻

租活动可能是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的。每种情形都很有可能。在很多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下,这两种情形下的受益结构都得到计算。一般性的结论都有争议性,但是在更常见的市场假设下,还会得到非常明确的结论,并且与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用其他的推理得到的结论相同。

简言之,这里最基本的不同在于,很多经济活动受制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影响,如图 6.1 所示。首先,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在下降,但是边际成本下降得更快。然而,两种成本都上升时,边际成本也比平均成本上升得更快,它们在平均成本最低点相交。

尽管通过几何就可以得出这个理论,它也吻合真实世界的情形。某些活动的规模经济使得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处于实际总成本的右边,尽管现实中未必如此。我们考察公共事业这个常见的例子,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法定的垄断者。如果存在这种规模经济,就不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去寻求法律保护以免于竞争。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仅仅为了得到双重保险,才去寻求法律保护;也有可能,它们在过去竞争强的时候得到了保护,而今天其他厂商就不容易与它们竞争了。无论如何,要是在最大销售量之上存在规模经济,那么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认为我们陷入了麻烦。但很多经济学的工作就是为了处理如图 6.1 所示的 U 形成本曲线。^[3]

我想证明,寻租活动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让我从一个竞争性市场开始,然后再转到垄断市场,最后来讨论垄断性竞争。在所有情形中,我最后得到的结论都和传统经济学家得到的结论相同。而且,我实际上也不能说自己强化了他们的推理,因为它们已经够明显了,不需要强化。重申一下,我现在做的仅仅是建立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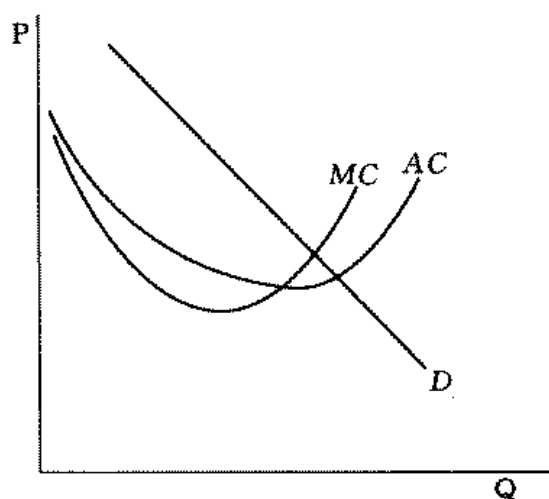


图 6.1 超额需求

市场分析认为,我们有很强的激励使得市场进入均衡状态,此时需求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相交(如图 6.1 所示)。我将用稍微不同的思路来论证同样的结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市场通常并不处于上面所描述的长期均衡状态。原因在于需求在波动,且在一定程度上生产成本也在波动。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市场是如何处理我们所谓的短期波动?市场又是如何处理长期变化(这种变化要求资源流入和流出该产业,以达到均衡)?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以为大部分企业是这样组织生产的:它的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端是扁平的,这样它们就可以生产不同的产量,但是利润基本不变。也许大部分有效率的生产企业的成本曲线有这样一段扁平的区域,但据我所知,并不存在这样的常规。如果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常规,那么当一家企业投入资源建立一个具有这类特征(即底端扁平的成本曲线)的有效企业,但不如在某一点最有效率时,它就会被驱逐出市场。

那些在成本函数底端的较窄区域里进行生产的有效率的企业

就在这一产量上运作,售其所能。如果一个竞争者和它在同一个价格水平竞争,它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亏损较小。扁平的区域必须处处高于灵活性较低的企业的最低成本点。因此,我在这里复制的初阶教科书上的标准图形是很准确的。

在图 6.1 中,我们看到了如下情形:需求大于厂商在最低成本处的供给。对传统理论家来说这并不奇怪,他会指出,由于行业中存在着超额利润,所以人们就有积极性将资源投入该行业。在寻租理论中,我发现了可以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利用《有效寻租》一文中的寻租表 1^[4],我发现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区域(即平均成本曲线上升的区域)里,在低于对手的产量水平上经营可以获得利润。

注意,这里的利润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性。一般而言,企业在边际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处的产量下经营要比在更低的产量下经营得到的利润高。但是,产量稍微下降,则资本的收益率会更高。传统的分析假设必需的资源由所有者拥有,且不考虑企业所有者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在其他地方进行投资。假设你能以 6% 的利率借款,并且需要借 10 万美元购买必需的原材料来进行生产,这样就可以达到边际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假设可以正确地画出边际成本曲线,这笔借款在下面的意义上就是有利可图的:边际收益高于要付的 6% 的利息。在一定的程度上,如果你没有借到这笔资金,你在所有资源上的收益率就会下降。

在这里,传统理论就会认为:资源的整体最佳收益率就发生在这个区域内。但实际上,如果企业借了这 10 万美元并用它取得领先其他企业一步的生产设备,即在其他地方建立工厂,那么所有资本上的收益率就高于只投资于一个地方。

遗憾的是,这里的分析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首先,组织不

能灵活地做到在投资不足的同时保持边际成本曲线不变。例如,如果边际成本曲线是根据如下的假定得到的:企业本身不能随时调整,唯一短期必要调整的是雇用额外劳动力。为得到同样多的生产,劳动力上故意投资不足的决定就可能导致另一条更差的边际成本曲线。然而,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这里的分析表明,真正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价格和产量会在图 6.1 所示的价格和产量的左边,并利用其多出来的资源增加产能。换言之,这意味着它们达到新的均衡价格可能要比标准的分析快一点。我开始就说过,我想说的是相同的内容,而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图 6.2 所示的是,总需求低于行业的生产能力;因此,生产处在平均成本曲线下降的地方,但也处在边际成本曲线上升的部分。在这里,传统的看法就会说,如果这不是简单的短期波动,那么资源就会从这个行业流出。现在我要说明的是,从寻租文献来看也是这样。

我们再一次转向有效寻租框架,现在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区域内进行生产。然而,这些经济规模仅适用于平均成本,而不是边际成本。因此,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是有所区别的。在这一范围内,边际成本使得规模经济呈现负值;因此,上面关于产量低于竞争对手的分析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如果我们位于边际成本下降的区域左边很远的地方,这个结论就不成立。通常更可能的是,经济很少出现这样萧条的局面,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如果价格下降到平均成本以下,我们会再次发现企业会比其竞争对手生产得更少,但却有很强的激励去将资源向行业外转移。这里如果不是重复的话,至少也是殊途同归吧,我们也得到了标准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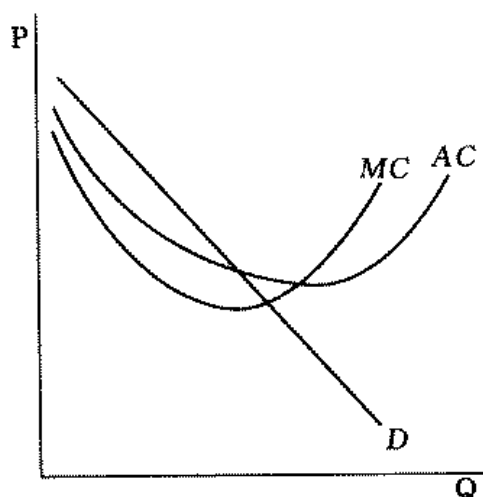


图 6.2 需求不足

现在我们来讨论垄断的情况。这里寻租理论对比较薄弱的传统分析进行补充。如果仅有一个生产者,明显的企业的决策是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唯一的特殊的情形是,在整个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平均成本曲线始终是递减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足够大以至于仅有一个生产者可以生存。暂且考虑这样的情况,边际成本曲线和成本曲线都会上升,所以行业有了让其他企业存在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寻租理论所真正要说明的是,企业必须进行投资来保证其垄断。这也是很多传统经济学家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寻租方法的唯一好处是它分析得更清楚。一种投资的方法就是制定比利润最大化价格更低的价格。另一种方法是保持产能过剩,因而当另外一个企业要进入该行业时,它可以扩张并使后者不能获得利润。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者还提供了很多其他方式。所有的寻租理论观点都认为,保证垄断地位的确耗费了很多资源,这对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寻租理论在这里的一点小贡献是,它指出了如果垄断是通过利用某种政治过程得到的,那么资源也被浪费在获得这一政治支持

上。据我所知,传统的产业组织文献没有考虑这一点,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经济学中最大的困惑:规模经济使得整个行业内只有一家企业的生产是最有效率的。不管按照传统的理论还是按照寻租理论,在自由的市场上,将只有一家企业存在,而且不管是按照哪种理论,对什么是合适的社会政策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对于那些没有阅读过我的文章《管制管制者》^[5]的读者来说,我首先要表明的是,我主张废除所有保护垄断而限制竞争的法律,因为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垄断不是自然垄断而是法定垄断;其次,可以让企业制订任何它们想要的价格,但通过征税拿走所有的垄断利润。所有的税收都会导致另外的扭曲,但是这样征税比大部分税种造成的扭曲要小。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我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从寻租理论得来的,只是一种一般性的偏好。

关于寻租理论在这里的应用,我们所能说的是,问题很真实但也是困难的。寻租文献的贡献(这是很小的)就是关注如下可能性:这不是自然垄断而是依靠寻租活动来获得的法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会使得传统的产业组织研究者感到惊讶。正如我在本章开始所述,我只是强化了标准的结论,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很成熟了,不需要什么强化。

注 释

[1] *Toward a Theory of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7-112.

[2] 这个注释是答复对原文的一些评论。整个交流出现在下面这本书中: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91-146.

[3] 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市场活动一开始就受制于规模不经济。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些,但至少理论上是存在的。在艺术创作中我们会找到一些例子。

[4] Rowley, Tollison, Tullock (1988, p. 102).

[5] *Government Controls and the Free Market: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70s*, Svetozar Pejovich (ed.)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1-159.

第七章 策略性行为、混合策略和纳什均衡的缺陷

我反对使用纳什均衡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两点：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模型，为了简化的需要忽略了真实世界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在混合策略下，全部的纳什均衡出现了逻辑问题，类似于说谎者的悖论。

让我从举个简单的例子开始，选自本人的文章《有效寻租》^[1]。方程式 7.1 和 7.2 表示了两个参与者 A 和 B 的效用函数，这个博弈存在很明显的规模不经济。

$$\pi_A = 100 \left(\frac{A \cdot 5}{B \cdot 5 + B \cdot 5} \right) - A \quad (7.1)$$

$$\pi_A = 100 \left(\frac{B \cdot 5}{A \cdot 5 + B \cdot 5} \right) - B \quad (7.2)$$

在由这两个方程式所描述的博弈中，非合作纳什均衡是每个博弈方投资 12.50 美元，并各有 50% 的机会得到 100 美元。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的期望收益是 37.50 美元。他们的净收益是投资的 300%。这似乎是非常高的利润，但这里的数字是为了简单起见有意挑选的。收益更加现实的类似博弈可以在上面提到的《有效寻租》^[2]一文中找到。

假设 A 不是投资 12.50 美元，而是 12 美元。他的预期收益降至 52 美分，且他仅仅得到 50 美分，显然在这个博弈中他犯错了。

当然,B 会获得 52 美分。

然而从更广的视角来考虑,假设 A 和 B 可以投资于其他地方。假设他们参与了为专利而进行的寻租活动,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储蓄的钱投资到其他项目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就是理性的目标。每个参与者投资 12.50 美元,净收益就是投资的 300%。然而,如果 A 将其投资减少到 12 美元,他得到的收益将是投资的 312%。当然,B 也有利润,但他的收益率仅能达到 304%。

A 的投资减少了 $1/25$,如果他在 24 个专利研究项目中都这样做,他就拥有了第 25 个项目所需的资金。全部 300 美元的收益率是 312%,比起 300%或 B 得到的 304%都要好。

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是最大化投资的绝对收益还是收益率呢? 如果企业拥有无限的资金,或如果能够以固定利率借到任何数量的钱,那么绝对收益就是正确的答案。在更为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资产还是借款都是有限的,因而最大化收益率更为合适。

当然,上面的讨论适用于他的部分投资。从他全部的资产组合来看,最大化收益率和全部绝对收益是等价的。当现实的投资机会所需要的资金超过企业家的资金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就会更关心每笔投资的收益率,而非它的绝对收益。

而且,在这种类型的博弈中这一现象很普遍。《有效寻租》中列举了很多不同的情形。在我当时写这篇文章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它引发了很多评论,我的《重陷泥沼》^[3]使得这些评论暂告一段落,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博弈的分析更具一般性。

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纳什均衡的例子引发了很多类似的问题。存在的外部因素(在现实中的确如此)常常使得博弈方选

择纳什策略是不合理的。注意我这里所讨论的与承诺没有关系。在上面的博弈中,即使在 B 选择了 12.50 美元后,A 选择 12 美元也是明智的。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混合策略。希尔曼和萨密特(Hillman and Samet)^[4]得出如下博弈的一个混合策略:在这个博弈中,博弈方为了 100 美元而竞标。然而,标金最终是被留下而不是归还投标者。如果博弈中只有两个参与者,混合策略包括每个参与者都以均等的概率选择 0 到 100 之间的数额。然而,假设我(和希尔曼及萨密特竞标)选择了很高的数额,比如 95 美元。^[5]我采用混合策略并随机选择一个数的预期收益与他们的是相等的。另一方面,希尔曼和萨密特失败的可能性的确很高,他们不是从博弈中出局就是放弃自己的策略。

选择 95 美元的动机可能有很多。例如,我可能仅仅是不喜欢希尔曼和萨密特。或者我感觉,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元气大伤。

在 19 世纪早期,香港有三家主要的商行:太古集团(Butterfield & Swire),怡和集团(Jardine & Matheson)和一家美国企业——宝顺洋行(Dent)。它们的运作方式可以近似地看做纳什均衡。太古集团在特殊的环境中占优,它所采用的策略类似于我上面的支付 95 美元。宝顺洋行从来没有从损失中恢复元气。而太古集团摧毁竞争对手的净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确信希尔曼和萨密特愿意承担风险而非不确定性。因此,通过改变博弈,使得不确定性代替了风险成了主导因素,我会将他们逐出市场,从而自己赢得大量利润。

尽管以上讨论的是希尔曼和萨密特博弈这个具体的例子,但是这里的思想对任何一种混合策略博弈都是成立的。如果对手采用

的是合适的混合策略,你可以选择由于某个外在的原因而喜欢的混合策略。例如,在矩阵 1 中,行博弈方可能是风险规避者或是风险喜好者。注意,仅当另一方不采取这一行为时,你才可以采取这一行为,这再一次说明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6]

		$\frac{1}{2}$ 列 $\frac{1}{2}$	
行	$\frac{1}{6}$	+10 -10	-10 +10
	$\frac{5}{6}$	-2 +2	+2 -2

矩阵 1

在这个博弈中,如果行博弈方确信列博弈方严格遵循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泰恩(Morgenstern)的理论来行动,那么他就可以根据风险规避程度在两个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纵向参与者可能更倾向于大概率的小损失和小概率的大收益,而不是相反。如果其中的一个人感觉对方将按照“正确的”混合策略行事,那么他就会有激励来偏离计算出来的混合策略。最起码,如果他感到对方将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就没有激励去花时间计算他的策略。

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认为,按照计算出来的混合策略行事仍然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当对方不这样做的时候,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险作用。[7]然而遗憾的是,混合策略不能降低真实的风险,而是可能的风险。当我选择一种策略时,我事前的风险可能不同于混合策略带来的贴现值。但是,一旦我掷骰子并按某一特定

的策略行动,那么我的处境就像已经选择了一个策略一样。混合策略包括两个步骤:计算随机策略,然后在混合策略集中随机选择一个具体的策略。在第一阶段我的风险较小,但既然我一定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行动,结果就没什么保证了。

这个讨论得出了我们最后的一点:任何一个纳什均衡策略都可能需要仔细算计来决定,但其特征是容易猜测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认为对方将不会仔细地算计,那你也不会仔细算计。可能你随意的决策和仔细做出的决定是一样的,因为其他人的推测会对你产生正的外部性。这样一来,你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一直在论述如下情景:如果你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到了纳什均衡,那么我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我能做得更好的原因在博弈的数学定义之外。但这些因素在现实世界中屡见不鲜。当它们出现时,我们就面临着类似谎言者悖论的局面。如果你相信纳什均衡,那么我最好不信。导致的纳什均衡的推理反而会偏离纳什均衡。的确,这种推理越正确,就越有必要偏离它。虽然这并非谎言者悖论,但也很接近了。

注 释

[1]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7-112.

[2] Buchanan, Tollison, Tullock (1980).

[3] 截至 1987 年的所有文章重印在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91-145, 但讨论似乎还在继续。

[4] A. L. Hillman and D. Samet, "Dissipation of Rents by a Small Number of Contenders", *Public Choice*, Vol. 54, No. 1 (1987), pp. 63-82.

[5] 参见同一期中我的评论"Another Part of the Swap", pp. 83-84, 和 Hillman and Samet, "Characterizing Equilibrium Rent-Seeking Behavior: A Reply to Tullock", pp. 85-88.

[6] 参见 J. C. Harsanyi, "Games With Randomly Distributed Payoffs: A New Rationale for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Po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Vol. 2 (1973), pp. 1-23, 对该问题有深刻的讨论。但在我看来, 他的做法好比在泼洗澡水的时候, 将孩子也泼出去了。

[7] Harsanyi (1973)。

第八章 寻租和转移支付

很多作者在谈论寻租时,一般或多或少将转移支付等同于垄断性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都是寻租活动的结果,通常导致严重的低效率。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政府的转移支付不是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不力的人那里转移到政治上组织得好的人那里。

“中部亚利桑那州项目”的成本可能至少是其收益的 50 倍。而且仅有一小部分农场主因此受益。这是典型的政府转移行为,而不是对穷人的慈善行为。当然,救助穷人并不一定需要政治组织来做。很多人都支持救助穷人。其政治渊源似乎是上层收入阶层进行的真正的慈善活动。向农场主、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拥有游乐场的人的大量转移支付,是政府更为常见的收入转移。

但是,大多数对寻租的正式分析研究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限制,很容易对转移支付进行类似的分析。的确,很久以前,在我的第一篇文章^[1]发表之后,但在“寻租”概念被介绍出来之前,我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转移支付的成本》。^[2]本章的目的就是重新来看这篇久远的文章。

如图 8.1 所示,我们有两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集团。A 和 B 分别在两个轴上。他们的预期收入由图中的点表示,O 点表示现状。

SS 线表示帕累托最优转移支付水平。它表示的是当钱可以无成本地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时可行的收入分配。很多传统文献都

在讨论收入转移时假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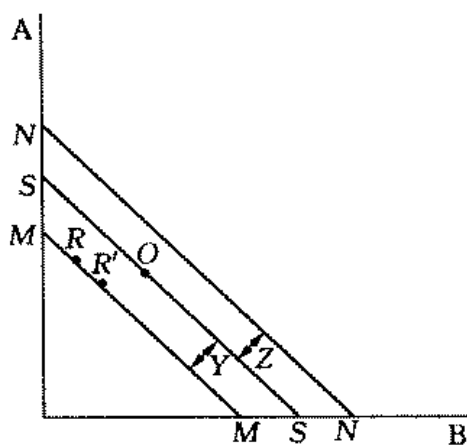


图 8.1 再分配及其成本

现在假设 A 集团想变得更加富有,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它们组织和投入资源。因为它们要投入资源,所以转移支付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且,这里我们假设寻租成本是唯一的损失。我们假设转移支付通过对 B 集团的人头税来获得,然后全部转移到 A 集团的每个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点 R。在这种投资下, A 集团的福利改进了,而 B 集团的福利下降了;社会的整体福利也下降了。新的帕累托最优的转移支付线 MM(通过两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衡量)处在距离前面 SS 线下方 Y 的远处。

注意,这次转移的全部成本并不是 Y,因为 Y 和两轴成一定角度。Y 实际上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其他两条直角边是 A 获得的利润和 B 遭受到的损失。B 损失甚大,而 A 所得甚小。

现在我们假设集团 B 奋起抵抗。当 A 集团在为了转移支付而进行游说时,集团 B 也参与了反寻租的游说活动来避免转移支付。我们假设,这两个集团的投资使得 R 点转移到 R'。这对 A 集团来说不利。事实上,这时对 A 集团稍微不利;对 B 集团来说虽然不

利,但不像第一种情况那么严重。

注意 R 和 R' 处在同样的帕累托最优线上,这仅仅是为了作图的方便,其实未必如此。在这两个例子中,大量的资源被社会花在了有关转移支付的努力上。在其中的一个例子中,这种努力很成功。虽然有小部分集团的情况可能变好了,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更糟糕了。

假设集团 A 用来获得转移支付的资源和集团 B 用来反对转移支付的资源都被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那么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会移动到 NN , 收益则由两条帕累托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从图 8.1 上并不能很清楚地看出,在这条具体的线上何处产量在下降。可能 R 点明显地比 O 点要不平等,或者更平等。在没有做进一步的假定之前我们得不出结论。

寻租活动的社会总损失可以表示为从线 NN 上的某一点到线 MM 上的某一点的变动,某些集团可能获益。在真实世界中,不仅限于 A 和 B 两个集团,会有更多的集团,需要用多维图才能表示出来。我在《互投赞成票模型的简单代数》^[3]一文中所用的模型可以用来表示这一多维模型,但是我认为用简单的文字也能理解。

假设垂直于这个平面还存在另外一个平面,表示在 D 和 C 之间的收入分配,如图 8.2 所示。那么就有一组帕累托最优平面。如果有更多的参与方,那将会形成超平面。假设在集团 A 决定如何行动之后,集团 C 才开始行动,那么结果就是在更高的一组平面或超平面上进行再分配。假设我们简单的两维平面是超平面的一个边,我们可以找出结果 P 点。现在假设集团 D 开始行动,这就使结果移到了 W 。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显然成本相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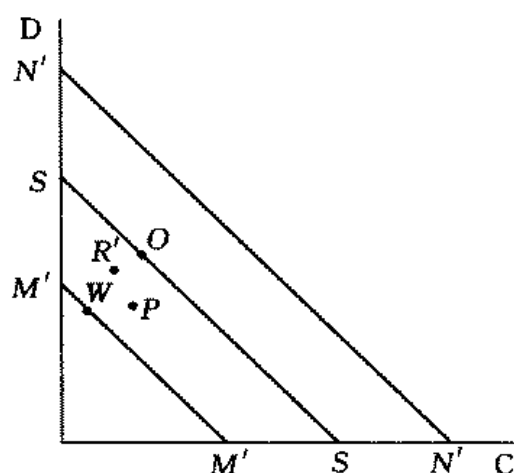


图 8.2 另一种角度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假设最低成本,即直接的转移,资金以现金税收或现金支付的方式转移,且以每个人为基础,因而这里没有额外的负担。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这样的。

为了更贴近现实,我们至少假设用于转移支付的税收是普通税收,它会带来额外的负担;非现金的转移支付将会是一种津贴,所以会造成额外的负担。除了我们目前为止分析过的成本之外,还可能有别的成本。既然仅是为了画图的方便起见,图中的线就不一定要移动,但显然现实世界中的成本会更高。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了,对这种转移支付进行伪装的必要。这意味着,转移支付的方法是低效率的,因为在民主国家,公开的转移支付是通不过的。这里和我们以前分析过的管制情况相类似。

利用低效转移支付手段(如以低于成本水价出售灌溉项目),虽然转移支付较小,但是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本上是破坏性的活动中去。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了一些低效的事情,而只有通过这样低效的方式你才能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其他人则会受损。

这种活动还会导致在华盛顿雇用说客这种有点间接的寻租成本,资源投入到次优生产方式这种更间接的寻租成本。这样,最后我们多少回到了以前的图所表示的结论:某种形式的垄断性限制就是转移支付。实际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本章旨在搞清楚直接转移支付发生的情景,并符合本书第二部分内容目的:不做任何主要的大改变,弥补现有推理的各种漏洞和缺陷。

注 释

[1]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 (June 1967), pp. 224-232.

[2] *Kyklos*, Vol. 24 (Dec. 1971), pp. 629-643.

[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June 1970), pp. 419-426.

第九章 寻租和税收改革

作为一名前中国问题专家,我知道“正名”是儒家学者的第一要务。因此,本章最好一开始就简要地讨论一下税收改革和寻租的内涵。我再次重申前面关于寻租的定义:利用资源为某些人牟取租金,并给社会带来了负的价值。

尽管这个特征定义得很粗略,但已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好定义了。我想要一个一般性的连续方程,其中包括实际活动的收益和损害及其成本。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建立出这样的方程。

第二个必须“正名”的概念是税收改革。税收改革一般的技术含义是指,对税法重新安排以符合一定的模糊的效率标准,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一定会增加或者减少。

但这仅是技术上的定义。我认为大多数普通公民对效率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税收改革还应有其他两个特征:税收应该下降,并且有点矛盾的是,对非常富有的人的税收应该增加。

在经济学专家和普通公民之间存在一种联盟:他们都反对“漏洞”。普通公民认为富有者的收益大部分来自漏洞,如果这些漏洞被堵住,可能他自己的税收就下降了。经济学家可能也认为富有者拥有太多漏洞了,但基本上认为漏洞并不是只惠及富有者,而是会引起资源的误配。

当然,这就提出了什么是漏洞的问题。最为普通的一个定义就是,在一个人应该纳税的地方,按照法律的某条规定,他却可以不纳

税。税法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税收和非税收安排,后者指不征税的领域。不同的税收安排使公民至少可以通过漏洞和“非漏洞”保留一些资金,这些安排本质上是比较任意的。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很多所得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累进的。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低于富人,但没有人把这作为漏洞。当然,这清楚地表明,不同类型的纳税人会有不同的安排。

通常的看法是,存在着一类普通的税收,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成功地获得税收安排,这样他们的一些活动可以免税,或者他们的一些开支被当做商业开支,并不作为收入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漏洞也存在于所得税以外的税种中。美国最高法院有一次发现它可以确定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因为对这两类食物的关税是不同的。^[1]

我们来讨论出问题最多的所得税方面。首先,列出漏洞的人们通常以比较奇怪的方式对待住房抵押的利率减除。这些减免是税法总漏洞绝对量的一部分,实际上占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当人们到处列举漏洞和税收可能的减少时,这一条却很少被提及。顺带一提,人们有时建议,对那些拥有第二或第三套住房的人而言,应该取消这种减免。

我认为这样做的政治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这种区别明显是任意的。同样道理,很多经济学家感到支出税应该比所得税好,因为它能鼓励投资。我从来没有听说哪位经济学家把这作为储蓄的漏洞。

然而,我将介绍一种比较人为的漏洞定义,它反映出我们所谓传统公共财政的观点。我把漏洞定义为一般性税法中的任何免除一些具体事情的条款,原因是这些漏洞往往会降低经济效率。难逃

的税,如实际所得税、销售税、增值税和房产税不会对资源在不同用途方面的配置带来很大的改变,只是将资源从私人部门移出。当然,它们会降低工作和储蓄的激励。〔2〕

然而,在所得税中对自然资源消耗方面的扣除导致了石油开采方面的过度投资。很多其他的特殊规定也有类似特征。

注意,使得资源发生转移的漏洞可能有积极作用。比如,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行业,如果没有补贴它们不能自负盈亏。一个更普遍的例子是,美国税法规定,对很多类型的慈善机构的捐款是免税的。显然美国公民认为这些机构应该得到补贴,但却不相信国会有能力去决定哪个慈善团体应该得到补贴。这种体系允许补贴由个人分配而不是国会。我认为这是个效率高的机制,而且是需要的。

撇开这些例子不说,大部分特殊规定是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的确,对慈善团体的免税而言也是如此,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团认为牛奶、手套等的生产也应该得到政府补贴,因此,免税是应该的。我对以前所得税法中对饲养赛马的冗长规定特别感兴趣。

假设出现了一个组织良好的游说团体,提议降低某个特殊行业的税率。回到我们之前对寻租的定义,这是否属于寻租,既取决于税收也取决于支出。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特殊税的减免是否导致资源的转移,以致整体经济下滑。为了保证这个特殊例子的完整性,假设漏洞的结果不仅使得一些特殊行业(如手套制造业)能够免税,而且也改变了余下的税制结构,从而使所有其他行业的税率都轻微提高了。显然,这会使社会福利下降。

但我们假设,当这种漏洞产生的时候,政府不是去提高其他行业的税收,而是去削减开支。那么这种减免是否必要就取决于钱省在了什么地方。诚然,在制造业还是存在一定的扭曲,但和支出削减的影响相比这无疑是很小的因素。例如,必要的节省来自于废除英属哥伦比亚鸡蛋联盟。^[3]对手套制造业免税而引起的经济扭曲,就不会像废除鸡蛋联盟而造成的经济扭曲那样大。

再举几乎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假设支出的减少削弱了环境保护委员会,使得空气污染加剧了。这种情况下,漏洞导致的损害是很广的。首先,是对制造业的扭曲,其次加剧了污染。我们可以清楚地把这种行为归于寻租。

注意,从组织寻租的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通过操纵政府来牟利,并不关心间接的结果,但我们仍然只是根据这些间接的结果,来判断它们是否属于寻租。

游说团有时为了一些大众的利益而游说。几年前我在《华盛顿邮报》^[4]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他们所谓国会“圣诞树”委员会的。令《华盛顿邮报》愤慨的是,拥有对关税控制权的国会听取了各行业代表的意见,并按其要求来做。但是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的观点有所变化,这些行业就要求降低关税。一般而言,他们要求在他们需要的原材料或者零部件上减少关税。

《华盛顿邮报》把这一行为看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的游说活动,这是正确的。说客来自各行各业。然而,毫无疑问,减少税收的净效用,可能不如整体上废除保护性关税,但仍然是有益的。坏税法中有漏洞要比坏税法中没有漏洞好。在这个例子中尤其如此,因为不存在收入效应。他们经过详细考量发现,大部分关税设置得过高,以致杜绝了进口。

很久以前,当我开始写萌芽于《同意的计算》^[5]一书中的《多数票问题》^[6]一文时,我指出不仅特殊利益集团的支出来自于普通税收,而且特殊利益集团的漏洞也可以来自于减少公利方面的开支。该文中的模型如图 9.1 所示。收入从普通税收被用作特殊利益集团的支出,或减少他们的税收是一贯的趋势。类似地,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转移支付和税收漏洞使得用于公众利益的政府支出不断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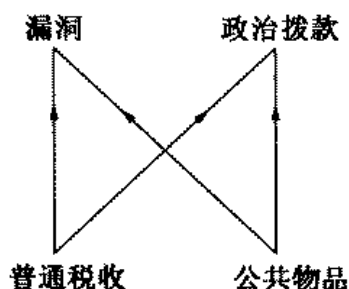


图 9.1 产生压力的机制

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减免(如慈善活动的免税)都是不合意的,也不是所有特殊利益集团的支出成本都高于其价值。但可能的情况是,所有为少数群体的特殊支出和影响他们的漏洞都是游说活动的结果。但有些时候,这些游说会给公众带来正的收益;有些时候则起码是无害的。按照我对寻租和非寻租活动的粗略的区别,仅有一小部分情况是我们所指的寻租。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希望看到政府转向一个普通没有漏洞的税收体系,除非某些行业真正需要特殊补贴。即使这样,我也希望补贴是采取直接而非间接的方式。我更希望政府停止那些实际上降低经济效率的大范围活动。现在的税收漏洞应该废止,大量的政府支出也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低但范围更广的税收水平。

显然,如果规定这不会触及他们的特殊利益,仅对其他人的利益有影响,这一改革将使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代表们高兴。反对这一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为数众多,他们常常参与直接的寻租活动。遗憾的是,他们组织的政治活动往往是成功的。

公共选择领域的学者们很久以来就指出,去除个人税收漏洞或

议员为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支出是很难的,但既然总体而言它们有损于每个人,那么废除这些条款的总体协议就不仅符合公共利益,而且也会被一致通过。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公众在这方面或者其他方面信息不灵通,那么就需要一次性的保留或者废止活动,而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小步骤来逐渐达到,这样,通过政治渠道来实现就很困难。第二,特殊利益集团则信息灵通,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奋不顾身。

如果汽车制造业能够使得除了汽车以外所有其他产品的关税和配额得以废除,这将很有利于他们。如果所有的关税和所有满足局部利益的政治拨款都得以废除,那么他们的福利改进会更大。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这个行业最优的可能策略是力争其他关税得以废除,而保留其特殊权利。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可能会得到多维囚徒困境矩阵中右下方而不是左上方的结果。

令人鼓舞的是,里根总统朝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个方向对税法进行了基本改革。当然,法案的颁布还远非完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还是得到了保护。法案得以通过的一个理由可能是,我们目前严重地依赖赤字财政;因此,主张某些开支的说客并不担心维持那些开支的税收。

所以绝非偶然,参议员蒙代尔(Mondale)在他的总统竞选中支持提高税率,州长杜卡基斯(Dukakis)也坚持提高税率。尽管这个观点是反民主的,其意图是将政治拨款拉到他们这一边。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种情况,那些想减税的人,无论是希望普通税率降低的经济学家,还是想获得漏洞的特殊利益集团,和那些想要增加开支或至少保持不变的人们发生了矛盾。我们再次发现,增加开支的一方是为了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以及更多的普通开支。

我之前描述过的趋势,从一般到特殊,都似乎表明,诸如提高军备方面的开支会被削减,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军官集团和国防部的公务员。每7名军人中就有1名军官(主要是中校以上级别),并且我们所拥有的每艘单独深吃水船上就有1名在华盛顿供职的海军上将。解雇四分之三的中校和上将,一定会提高我们的军备,同时也会节省开支。但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会争取斗争,而且一定会取胜。

救援穷人是利益集团存在但行动并不是很有效的一个领域。显然,穷人是支持这种活动的,且利用任何可得的政治资源来获得这种帮助。但是,实际上结果并不理想。例如,倒数第二阶层的人们接受到的转移支付比最低层的人要多。^[7]又如,相对而言,他们比19世纪中期的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8]

表面的解释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强。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缺乏能力完全是因为真实的身体疾病。这种能力的缺乏显然延续到了政治领域。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能力相对较低,我认为他们接受的钱大部分反映了高收入阶层的慈善冲动。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清楚穷人们是否参与了重要的游说。当然,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中产阶层的公务员和社会工作者在以穷人名义为其游说,尽管穷人们得到的钱不是很多。

在这里我们可能最好偏离主题,讨论一下经济学家的理想的税收。首先,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土地价值充公性税收是值得推荐的。当然,人们希望土地由州政府来征用,因为这样就没有额外的负担,而能够为土地投机者保留所有的投资收益。在已经有居民的地区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未被占用的地区,按照将来征收一定的土

地税的协议对土地进行拍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的第二个领域是,对过量生产的产品进行征税。空气污染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计算出适当的税率,就不会存在额外负担,而实际上会有额外收益的。

遗憾的是,在这些情形中,资源都会被用来创造低效的制度。例如,人们可能希望土地是免费的,也许从他们的个人观点来看,其最高价值就是用作露营旅游的临时场所。同样地,人们可能把资源投资于污染税的设定上,以至于污染税不是太高就是太低。^[9]

这些不需花成本、或几近如此的税收并不足以支撑起现代化的政府,所以我们还须借助另外两个税种。其中一个是一般税,这是漏洞频出的地方,也是当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税改时所提及的税种。

然而,在转向这一领域之前,我要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政府有很多活动,其影响非常广泛,但并不会涉及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解决措施就是使用税,但很难设置这一税种。例如,气象局对农民和计划飞行的人来说比办公室里的人要重要得多。但是,我们很难做到对受益的集团征税,却不向其他人收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来看向使用者征税的可能性。在美国,维持公路系统所需的资金一部分由地方政府的燃油税支付,一部分由房地产税支付。根据大致的经验,主要的高速公路是由燃油税支付的,而地方支线公路则由房地产税支付。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安排是大致接近理想配置的,但也不是那么离谱。

然而,很难对这些服务进行筹资,从经济上说,这需要依靠普通税收。毕竟,如果我们全方位地需要这些服务,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由于税收所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就会一样多。

但这是从经济上来判断,而不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如果为特殊

集团需要的特殊服务不是由普通税收来融资的,那么由这些特殊集团进行的寻租就会导致过度支出。多年以前,詹姆斯·布坎南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应该挑选出另外的一个群体(可能以随机的方式),其规模与受益集团相当,并对他们征税。这样,我们就会有两个游说团体相互竞争,结果可能会有所改进。[10]

这样的做法是将我们现在的预算程序转变成更传统的体系。如果我们追溯历史,通常会发现压根没有政府预算这回事。单独的政府服务是通过配置从量税或部分从量税来支付的。举个例子,西班牙海务大臣从每艘拜访西班牙港的船那里征收一单位金几尼。提高其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鼓励更多的船访问西班牙港,或者和其他政府部门相互竞争获得其税收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能容易地想像出这种情景。税收可能被配置到个别的政府机构,大量税源遭到破坏。随便举个例子,75%的个人所得税可能流向了国防部,最富的五分之一人群的所得税也可能流向了国防部。

这意味着,个别政府机构和寻租团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那些与它们有相似规模的对立集团之争。和现在的方法相比,我认为这会导致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尽管我认为,从任何理论上来说这都是非最优的,其目的是使各个游说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说客是否是寻租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立场,并且可能每个预算年度都会有变化。

例如,假设在一场重要的战争中,我们税制下那些主要为军备买单的高收入阶层人们游说政府削减开支;而那些军队的支持者,包括军官集团则游说增加开支。我们可能认为,高收入的人在这件事中是寻租者。一旦战争结束,急剧地削减军队规模(假设我们战

胜了)就是合意的,我们可能就会指出军备供给者和官员是寻租者,并且不再称呼那些富有的纳税者是寻租人了。这是我之前粗略区分的结果,我再次重申希望能有人对其进行改进。

上述这些有点题外的话是关于最优税收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有最优税收,当我们思考税制立法时,通常看到的是人们努力使得税收体系更加低效,花钱更加铺张浪费。这显然是寻租行为。

如果我们旨在对存在外部性、但是没有惠及所有人的服务的受益者征收特殊税,就会出现防卫性寻租,寻租活动就会在普通税上为特殊集团打开大门,将特殊收入和一般税收转移到特殊开支上。只有当寻租者寻找到漏洞,并且因漏洞导致的损失的收入能够通过停止浪费性支出来补偿,我们才能不把这种游说活动视作寻租。一般而言,税收改革上的寻租活动和其他领域的寻租活动一样不受欢迎。

的确,当说客参与了制造漏洞时,这是否属于寻租就取决于如下标准:没有漏洞的情况下,这些钱是如何花的。我们支持如下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果减少政府开支是合意的,他们会努力活动以减少自己缴的税收。当情况并不是这样时,我们称之为寻租且指责这一行为。重申本书潜在的主题,这一寻租的概念是粗略的,但也是最好的定义了。

总之,税收改革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改革成功,将会大大降低寻租和其他的政府浪费行为。遗憾的是,寻租者有动机去抵制这种“改革”。但幸运的是,他们的反对并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每个人都会失去特权的,讨价还价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努力,有一天这会变成可能。

注 释

[1]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是酿造技术的专家,有一次花了很长时间,投入很大精力去研发一种尝上去像葡萄酒的饮料,但是从技术上来说是啤酒。当然,其优势在于这种饮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

[2] 如果钱被用于真正的公共品,那么整个方案的结果可能会增加这些激励。

[3] 鸡蛋联盟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当联盟结束时,会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保留现在对鸡蛋生产商收取的费用。

[4] 这一引用现在不见了,如果想要找到它,我记得是在第一页。

[5] 和 James Buchanan 合作(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LXVII (Dec. 1959), pp. 571-579.

[7] 数字来源于我的著作 *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83), p. 94.

[8]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7.

[9] Dales 教授的可交易污染权相对污染税而言,较小受到寻租活动的影响。

[10] 最近,这一建议以不同形式被用于参议院中。额外支出的提议一定要伴随着被提议的税收或其他方面的支出削减。

第十章 总结性思考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为国务院工作。我在国民党时期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生活过,也在李承晚总统的韩国生活过。^[1]尽管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思考寻租(的确,我只不过把这些体制称为腐败)^[2],但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对我最终发现寻租非常有关。

特别是在中国和韩国,我看到了古老的高级文化:人民勤劳智慧,文明源远流长,创造出的艺术品让人惊叹。这些文明的政府直到 1750 年还被旅行者敬仰,并且在维护国内外和平方面,比欧洲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那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贫苦中。

但事情有另外一面。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住在原来是英国租界的天津。当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达那里时,租界制已经完全结束,外国人和中国人居住在外国租界的特权也消失了。然而,一个人很容易分辨出他是否在租界里面,因为租界边界的建筑物突然减少了。^[3]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外国人的天津俱乐部实际上是设在租界之外的,很多外国人的家也是如此。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反而居住在租界里;二战之前,富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有时也住在租界外面。理由很简单:英国人和美国人享有不受管辖的特权,而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却没有。甚至还不断听说,即使是富有的中国人也有一条惯例:不踏出租界地半步。

最后一点,天津租界原先是在中国人居住的天津城外的一块湿地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后来迅速发展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而且和老城区相比,它拥有更多建筑和稠密的(尽管更少些)人口。

外国人通常这样解释,在那些地区人们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然而,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是个优点。诚然,当我在那里时,从1911年就开始的内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在这场复杂的内战中,城市内部的交火甚至炮轰或轰炸都很少。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躲避自己的政府,反而喜欢这些欧洲政府的次级样板呢?

再次重申,当时我以为这是因为腐败,现在我要说这是因为寻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去远东之前,我曾经系统地学过人类学,我并没有赋予“腐败”这个词任何负面的道德内涵。我意识到我们所指的腐败已经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中国人也并不是特别反对。然而,它们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李承晚总统统治下的韩国也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发现了更多这样的情况。

由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与韩国之所以这么穷的最根本原因是,这种体制使得经济进步很难发生,尽管它们拥有高素质的人和辉煌的历史。当时,我感到难以解释这种现象,但现在我认为可以用寻租理论来解释。

有趣的是,另外一位寻租领域的开创者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她是独立开创的),也在非欧洲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类似的事实,比如,印度和土耳其比中国更加明显。特别是印度所表现的问题和中国很类似:拥有显著的高度文明,过去取得过大量的成就,但人们却生活疾苦。寻租领域的第三位开创者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实际上就是一位来自属于最上层阶级的印度

人,他试图将这种现象称为 DUP(直接非生产性寻利)。

当时令我困惑的是,芝加哥尽管也很腐败,但却没有那么穷困。当然,芝加哥处在一个大部分都不腐败的社会中,这无疑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在天津的中国人(大部分人是在租界度过一生),他们很富有但却不拥有政府赋予的特权。他们主要从事外贸,这样就能使其多少从腐败的社会中摆脱出来。

再次重申,“腐败”一词所涉及的道德含义,在此是得不出来的。人们不会去做那种被认为是显眼或容易招来批判的事情。很容易想到的是,高层的政治职位或者与高层政治人物的友谊将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经商赚钱被认为是不体面的。^[4]

我所观察到的是,在社会中有些勤劳的人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却想着通过和有权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来达此目的。作为美国的副领事,我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讨厌的,因为我完全不能让这些人相信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时,个人关系(特别是和我的)一点用都没有。

我本人和签证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却经常亲手将签证申请从我的办公室递给签证办公室的官员,因为签证申请者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认识我,但不认识签证办公室的人。在很多场合,一些想要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的中国人都会问我是否可以帮他们递申请。我试图让他们相信,那些签证官不在乎他从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国副领事那里拿到的申请,但这种努力总是不成功的。顺便提一下,我的长官(我感觉他并不了解地方情况)经常阻止我满足这些请求。我认为这是无害的,而且能减轻那些中国人的紧张情绪。

显然,同样的这些中国人,当他们从中国政府中摆脱出来时,例如在国外租界、香港或帝国时期在东南亚散布的那些地方,或是现

在美国,他们都能做得非常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奖学金和个人关系的兴趣在西方类型的社会中有所帮助。他们也意识到在西方国家不能仅单独依靠关系,必须得有“产出”才能前进。不乏才能的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但这一体系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精力都被投入到现在我们称之为寻租的领域上了。我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同样有害的第二个效应,而且获得的特权并不可靠。在政府的支持下,另一个寻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而且,这个体系将财产视为特权。因此,对人们而言想转移到这个体系之外,并从事我们西方所谓的商业活动,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活动被大量的寻租活动所控制。

因此,在中国,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智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是对赢者而言获利颇丰。物质上进步缓慢也是这个体制的特征。在很多情况下,资源实际上进入了对其他人而言并不产生消费者剩余的领域,反而存在负外部性。如果我被任命为海关边检员,这意味着其他人就不能这样了。

我之前仅有的类似经历是在芝加哥,我对芝加哥的政治所知甚少。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述,芝加哥嵌入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之内,能够弱化这种情况的影响。现在我意识到,如果通过更加细致的观察,我会在芝加哥发现一些类似的现象,在美国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美国城市都采取了分区制。这使得大量房地产所有者处于相似的局面中。很多地方的土地价值严重依赖于地方分区管理局官员的任意程度不一的决定。

即使地方分区管理局完全清廉,不受外部干扰,并且能根据完整的区域经济学知识做出最好可能的决策^[5],个人也会受害于较

武断的决定。在他的土地上能做的事情并不取决于他自身的福利，而是很多邻居的福利。从他的角度来看，政府对他的决策造成的外部性的考虑基本上是任意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业迅速培育出一些专门操纵地方分区管理局的人，也滋养了腐败的地方分区管理局。

尽管这一体系和今天印度的一些地方很相似，但它却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在一个以不同方式运作的体系中。所有的分区管理局都是地方性的，尽管他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房产所有者的财富，但不拥有任何房产的普通居民甚至可能都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某一遥远地区的购物中心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该地区的所有者和住在附近的居民。然而，如果整个社会这样运行，对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成本会很巨大。

因此，我坚信当寻租普遍存在时，其代价是很高的。19世纪美国 and 英国也存在一些寻租，但却没有广泛的影响。而且，19世纪后期很多国家开始模仿英国的基本体制，结果寻租在世界范围内减少了。需要强调的是，寻租的减少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神奇的方法，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规模相对变小了。

私人垄断组织正好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事实上，很难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中组织私人垄断。大部分定价高的垄断是靠了政府的保护。^[6]

对大部分人口的直接转移支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自从普林斯·俾斯麦创造出福利国家，这些体系在现代经济中日益膨胀。投入这种安排的钱实际上已经足够多了，尽管严格说来，转移支付部分并没有这么多。例如，医疗保险机制有时是靠私人促进的，有时是政府。如果我们通过为每个

人购买私人保险来套现政府项目,并将这和英国国家医疗体制相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国家体制比私人保险更加平等,但也不是很明显。[7]

养老金建立起来以后也是这样。它们基本上是低效的,如果你一生中都没有这种体系,你原本可以通过储蓄或投资保险费来改进福利。这些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累进的,因为它们将资金从穷人和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不过这一转移较少。[8]

这里的问题是,在大多数西方社会,染指这些大型方案的直接成本是相当困难的。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方案的影响相对于购买保险是很小的。[9]而且,计算实际影响是困难的。因此,寻租努力与转移支付的规模相比可能很小。我口述这本书的期间,阅读了一本新书的样书《10 亿美元之影响:政治的直销》。[10]它仅涉及政府影响商业的一个方面,即直接邮寄广告。当从相关利益来看,10 亿美元似乎很少。

如果在华盛顿看到国会议员被带入昂贵的餐馆里等等,这同样属于寻租。从数字上看,绝对很大,但是考虑相关利益,这似乎又很小。

我仍然相信所有的这些只是被掩饰的实际成本上的泡沫。特别是,我在本书第二和第三章中讨论过的形形色色的伪装是很重要的。[11]这些现象显然有很多,但是衡量任何一个都是困难的。

总之,在我看来,寻租是个高成本的现象,严重地危害到我们的社会。衡量其成本是困难的,甚至对其进行染指都是困难的。本书的第一部分就讨论了成本衡量的问题,并指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第二部分涉及的主题较多。如果寻租如我认为的那般重要,那么研究寻租理论就有必要。

在这一部分,我讨论了很多理论上有待改进之处。这部分文章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当然它们都是关于寻租的。之前两本有关寻租的书^[12]都是论文集,已经出版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之前两本书的继续;而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关于某个主题的一篇长文。

我想要以开始第二部分的方式来结束本章和本书:讨论寻租的合适定义。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对寻租的定义比较粗糙。我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定义,这个定义使我们既可以考虑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又可以考虑我们所称的销售努力上的过度投资。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定义。我们没有办法去衡量如下情形下在销售上的过度投资:其最终结果本身是合意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仅仅将寻租这个概念限制在我们知道的低效的制度上(如保护性关税)。因此,我们讨论获得保护性关税的成本,是根据寻租和反对保护性寻租的“避免寻租成本”。而销售肥皂的成本则不在两者之内。再次重申,我想要有个连续函数来将这三者统一起来考虑。但是,目前我们多少仍只能局限地运用寻租理论。

不管读者们是否赞同我的定义,我希望他们至少对其进行认真思考。的确,这也是这本书的希望。寻租是个崭新的领域,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本书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注释

[1] 我在大学期间和实习法律时,也住过 Kelly-Nash 体制下的芝加哥。在某些方面,这和李总统下的韩国很相似。

[2] 也在芝加哥。

[3] 顺带提及,在摩纳哥也是这样。在组成公国边界的街道上,两边建筑物的平均高度不同。

[4] 在帝制下,商人尤其是银行家和演员、妓女等一起被称作“流氓”。然而,在香港和澳门做外贸的一些富有商人能够绕过这些障碍。

[5] 我认为没有区域经济学家可以做出这样的完美决定,但是他们却会比一般的政治家强。

[6] 显然有很多例子都说明,在现代工业早期,某些企业实际上在效率上有足够的优势,从而可以通过低价竞销来有效地获得垄断地位。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的,不管奥地利学派如何看,我们都不能以此为依据。

[7] 对政府医疗服务基本的批评就是,它主要关注于其运行的效率,而不是相对的平等。重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每个人都需要购买一份保险合同,但这却不是好合同。

[8] 从穷人那里的转移支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即使没有养老金体制的存在,真正贫困的人也会得到国家补贴。顺便提及,对于国家医疗体制也是这样。因此,比起没有这些体制,他们依靠更多传统形式的救助,穷人在这样的医疗和养老金体制下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他们的税收比起传统体制又相对高了很多。全面的讨论请参阅 *Economic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Boston: Kluwer-Nijhoff, 1983), 111-136。

[9] 由于政府和私人保险都存在风险,风险规避就是指在这两者间分配保险。

[10] R. Kenneth Godwin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House, Inc., 1988). 10 亿美元是对整个产业来衡量的,而不是对给定选举或提案的影响。

[11] 第三部分涉及这是否算成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主观上我认为这是成本。这些成本当然会阻碍经济增长。

[12]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参考文献

- Becker, Gary. "Public Policies, Pressure Groups, and Dead Weight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8, 1985, pp. 329-347.
- Brennan, Geoffrey and James Buchanan. "Voter Choice: Evaluating Political Alternativ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29, November/ December 1984, pp. 185-201.
- Buchanan, James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Derthick, Martha and Paul J. Quirk.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1985.
-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s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57.
- Godwin, R. Kenneth. *One Billion Dollars of Influence ; The Direct Marketing of Politic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9.
- Harsanyi, J. C. "Games with Randomly Distributed Payoffs: A New Rationale for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Po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2, 1973, pp. 1-23.
- Hillman, Arye L. and D. Samet. "Dissipation of Rents by a Small Number of Contenders." *Public Choice* 54, No. 1, 1987, pp. 63-82.
-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ibecap, Gary D. "Political Economy of Fuel Oil Cartelization by the 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1933-1972." August 1977. Unpublished.
- Miller, James C. III. "Policy Making in Washington: Some Personal Obser-

- at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84, p. 395.
- Muller, Dennis. *Public Choice II*. New Rochell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eltzman, Samuel.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ugust 1976.
- Reich, Robert B. and John D. Donahue. *New Deals, The Chrysler Revival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pp. 204-205.
-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42.
- Stein, Herbert. "Balancing the Budget, Compared with What?" *AEI Economist*, February 1987.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 Tollison, Robert D. and Gary Anderson. "Luddism as Cartel Suppor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December 1986, pp. 727-738.
- Tucson Citizen*, 11 March 1988, p. A-1.
- Tullock, Gordon. "Problems of Majority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7, December 1959, pp. 571-579.
- "Information Without Profit." *Papers on Non-Market Decision Making* Vol. I. Charlottesville, VA: 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1966, pp. 141-159.
- 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 "The Welfare Costs of Monopolies, Tariff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 Fall 1967, pp. 224-232; rp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9-50.
- “Simple Algebraic Logrol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June 1970, pp. 419-426.
- “Charity of the Uncharitable.”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9, December 1971, pp. 379-392.
- “The Cost of Transfers.” *Kyklos* 24, December 1971, pp. 629-643.
- Towards a Mathematics of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 “Regulating the Regulators.” *Government Controls and the Free Market: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70s*. Svetozar Pejovich, ed.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1-159.
- “Efficient Rent Seeking.”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7-112.
- 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Boston; Kluwer-Nijhoff, 1983.
- “Back to the Bog.” *Public Choice* 46, No. 3, 1985, pp. 259-263; rp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141-146.
-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rect Protection of Innovation*, William Kingston, ed.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ress, 1987. pp. 171-199.
- “Another Part of the Swamp.” *Public Choice* 54, No. 1, 1987. pp. 83-84.
- “The Costs of Rent-Seeking: A Metaphysical Problem.” *Public Choice* 57, April 1988, pp. 15-24.
- “Rents and Rent See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Charles K. Rowley,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51-62.